



重庆师范大学

本期要目

- 陈宝生：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历史成就与现实使命
- 铸魂育人成为教育界的行动自觉
- “应试”评估不是学科建设的全部
- “学位学徒制”：英国职教再升级

决
策
参
考

2019年第3期 （总第26期）

主办：发展规划处/党委政策研究室

目 录

【领导讲话】

- 陈宝生：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历史成就与现实使命 (1)
- 杜玉波：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水平 助推“一带一路”开放发展 (5)

【权威发布】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9)
-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 (18)
- 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 (24)

【教育视点】

- 铸魂育人成为教育界的行动自觉 (29)
- 顶层设计为教育落下重要先手棋 (31)
- 管培俊：为促进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化支持 (33)
- 瞿振元：知识生产视角下的学科建设 (36)

【理论前沿：学科建设】

- 人才培养成效是检验学科建设水平的根本标准 (45)
- “应试”评估不是学科建设的全部 (47)
-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54)
- 建立文学经济学学科的可行性 (57)

【院校动态】

- 复旦大学：江南文化研究院基地揭牌 (61)
- 武汉大学：“三个聚焦”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 (62)
- 东北林业大学：多措并举着力破除引才评价“五唯”顽疾 (63)
- 东南大学：扎实推进文化育人工作 (64)
- 福州大学：四项举措提升辅导员育人能力 (65)

【国际视野】

- “学位学徒制”：英国职教再升级 (67)
- 美国一流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经验和启示 (69)

★领导讲话★

陈宝生：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历史成就与现实使命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认真总结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宝贵经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要论断，进一步把“两个大计”转化为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不断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

中华民族素来有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憧憬着“学有所教”“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教育梦想，无数先贤为延续中华文脉、培养治世良才不懈求索。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党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推动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将这些梦想变为现实。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教育地位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升华，教育在党执政兴国中的战略地位逐步确立，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保证广大劳动人民的受教育权，培养新中国建设急需的人才。1949 年 12 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谋划和确定教育大政方针和发展蓝图。1950 年，毛泽东同志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上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面对百业待兴、人才奇缺的状况，邓小平同志以极富战略性的眼光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党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作出优

先发展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历史抉择。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胡锦涛同志指出，必须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系统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2018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系统总结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与经验，深刻分析了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全面部署，并提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要论断。这一重要论断把教育摆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把教育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做好新时代教育工作的行动指南。

我国教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70年风雨兼程，70年春华秋实。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彻底改变了教育底子薄、整体落后的状况，建立了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中国教育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力证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正确与宽广，有力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与强大生命力。

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新中国成立初期，4.5亿人口，80%以上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1949年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人数只有11.7万人。今天，九年义务教育已全面普及。2018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5%，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1.7%，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8.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国家教育投入力度越来越大，从2012年起实现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并保持连续增长。同时，我国教育的国际影

响力不断增强，从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的优异表现，到成为本科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协议《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70年来，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德育为先，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办学第一位，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历史任务，结合不同时期青少年的思想状况，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和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探索和实践，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听党话、跟党走，扎根人民、奉献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今年3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当前，青少年学生不断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积极健康向上。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人才和智力支撑。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几代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奋斗，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力人才和智力支撑。我们用20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义务教育普及之路，用十几年时间实现了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快速发展。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6年，新增劳动力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48%，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6年以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亿万人民通过受教育实现了完善自身、改变命运、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这一切是建立在70年前多数人是文盲半文盲的状况之上的，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实现的。

不断增强贯彻落实“两个大计”的自觉性坚定性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要论断，是对新中国70年来教育改革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从成功实践中一步步升华而来的理论成果，必须始终牢牢坚持。新时代，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两个大计”转化为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转化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政策举措和生动实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深刻认识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事业愈是重要，方向问题愈是紧要。教育的方向问题从来都是第一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关乎教育的性质，关乎教育的兴衰成败。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全过程，始终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深刻认识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实现独立富强，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繁荣的经济、昌盛的文化、强大的国防，而这一切都要靠教育来奠基。教育与人类社会共始终，传承文明和知识，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必须把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

深刻认识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所在。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课堂、学校是基本场所，教育是根本途径。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

深刻认识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维护政治统治、维系社会稳定，都要

通过教育。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深刻认识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全局是教育的重要使命。国兴科教，科教兴国。教育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服从和服务于一定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我们要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人才和智力支撑。

选自《教育部网》2019-9-10

杜玉波：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水平 助推“一带一路” 开放发展

同志们、朋友们：

七月的北京绿树成荫、燕语莺啼，我们迎来了“一带一路”沿线 26 个国家的 51 位外宾，迎来了国内 400 多所高校和华为、西班牙电信、海南航空等 200 余家知名企业的 700 余名代表。今天的“中信国安第一城”高朋满座，嘉宾云集。这里，我谨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对国内外嘉宾的莅临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届论坛以“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一带一路’教育国际合作”为主题，邀请国内外教育界与企业界的嘉宾，共商共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教融合、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经验、机遇与挑战，意义重大，正当其时。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战乱恐袭、饥荒疫情此伏彼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但我们坚信，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教育传承

过去、造就现在、开创未来，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时代需要教育以智慧、合作、交流，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展现时代担当。在这里，我主要就“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水平、助推‘一带一路’开放发展”谈以下几点认识，与大家交流。

第一，深化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彰显时代大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联的共同命运，需要我们共同面对安全稳定、繁荣发展和环境保护等重大时代挑战。应对共同的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在互信基础上加强合作，在互利前提下实现共赢，在互鉴过程中获得发展。当前，各国之间的互信合作、互利共赢、互鉴发展，都离不开教育这座基石，离不开深化教育国际合作这个途径。通过深化教育国际合作，可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可以增强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和科技互通，传承创新思想，启迪人民心智；特别是通过教育国际合作，可以培养青年、扶助青年，为他们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更好发展空间，夯实睦邻友好的基础，凝聚起共同发展的强大合力。

我理解，深化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要引进、利用国际优质教育资源，也就是“请进来”。当然，在“请进来”的时候，既要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要理性客观地看待和保持本国教育的独特优势，处理好“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要促进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也就是“走出去”。在同一个层面上“多对话、多来往”，有进有出、相得益彰。第三个层次是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也就是“深参与”。深度参与国际高等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制，建设具有本国特色和国际水平的专业、课程、教材、教学模式、治理模式、评价体系等，在教育合作中提升国家形象，扩大国际话语权，谋求各国教育协同发展。

第二，助推“一带一路”搭建教育国际合作舞台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

进入朋友圈；“一带一路”是多元的，涵盖各个领域，合作形式多种多样；“一带一路”是共赢的，各国共商共建共享，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我们要建的“一带一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在这条阳光大道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教育特色鲜明、资源丰富、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发展前途广阔。我们要努力把握这一重要契机，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国际合作。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号召，2017年8月底，我率团出访巴基斯坦，提出了中巴高校促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一揽子计划。当年11月初，在复旦大学召开“中巴经济走廊大学联盟”第一次交流机制会议，标志着中巴两国高等教育交流合作迈出了新步伐。2018年10月，我们在浙江大学召开了“中巴经济走廊大学联盟”第二次交流机制会议，双方参加合作的高校数量由19所增加到31所，合作学校的层次类型更为全面，合作的方式方法更为多样。2019年11月，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将在巴基斯坦召开，合作的规模和质量也将会有大的提升。通过近两年的实践探索，交流机制的吸引力、影响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巴高校希望加入到这一机制中来，这预示着交流机制的勃勃生机和大有作为。我们也欢迎今天与会高校和企业参加到这一交流机制中来，使得这一交流机制向更深层次拓展，向更高质量提升。

第三，高校和企业在“一带一路”教育国际合作中大有可为

教育无国界，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是世界各国加强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今天，来自国内外高校和企业的代表，围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型人才培养等问题深入研讨，互学互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经验与模式。这是中国教育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与会各国高校和企业深度合作的一个崭新起点。这充分说明，不论是高校和企业都对教育国际合作具有浓厚的兴趣、广泛的共识，也都可以在其中大有作为。

我认为，产业界要有支持教育事业的情怀，有强烈教育情怀的企业一定是永葆生机和活力的企业。我了解到，本次论坛的承办方——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自2011年创办这个论坛等一

系列活动以来，在关心和支持教育的过程中，企业自身也获得了跨越式发展。从最初仅有 7 家航空公司参与的展示会，发展到今天有 200 余家航空公司、机场集团、企事业单位参与的国际化盛会。这充分说明，一个充满发展前景的企业，一定要担当社会责任，要有服务社会、造福民众的抱负和情怀。同时，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会反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人才，提供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提供最高尚的文化引领。这是企业和学校协同发展的价值基础。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作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成立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学术社团组织，始终高度重视教育的国际交流合作，助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学会持续 27 年举办的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持续 18 年举办的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致力于服务高等教育国际化、服务教育装备产业发展、服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现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今年 10 月中旬将在兰州大学举办“2019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11 月初在南京召开“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期待在座的嘉宾们、朋友们莅临指导。

第四，深化教育国际合作是学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始终坚持“学术立会、服务兴会、规范办会、创新强会”宗旨，以“两会一刊”为核心业务，服务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学会新一届理事会成立以来，总结学会 36 年的发展经验，提出了包括办会宗旨、发展理念、核心任务、业务布局、工作思路、研究原则、基本经验、建设目标等八个方面的发展战略构想。学会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合作，把“拓展深化合作交流”作为学会业务布局的一个重要内容，把“谋合作，扩影响”作为学会工作思路的重要方面，把具有“国际影响”作为学会建设目标的鲜明特征。

为实现这样的建设目标，近两年来，学会努力加强与世界各国高等领域的交流合作。2018 年 9 月我率团出访美国，开启了学会与美国教育委员会加强合作的新篇章。今年 6 月 4 日，学会代表团再次出访美国教育委员会，双方进一步明确合作的意向，并提出一些具体的合作建议。6 月 28 日，美国教育委员会副主席布拉德回访学

会，双方就中美高等教育交流进行了新一轮积极磋商，初步达成了包括建立双方交流互访机制、开展学习培训、联合组织课题研究、共建研究成果交流平台、推动校际间交流合作等八个方面的全面合作框架。在中美关系发生一系列新变化的重大时刻，这样的国际交流对推动中美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目前，学会还与日本、印度、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工作联系，正在努力探索加强国际教育合作的新方法新举措新途径。我们愿意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推进国际教育合作搭平台、做纽带、架桥梁。

选自《中国高等学会网》2019-7-23

★权威发布★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现就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改革创新提出如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

1. 重要意义。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承担着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贯彻落实，思政课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也要看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有的地方和学校对思政课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到位，课堂教学效果还需提升，教材内容不够鲜活，教师选配和培养工作存在短板，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评价和支持体系有待健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需要深化，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思政课建设相对薄弱，各类课程同思政课建设的协同效应有待增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推动思政课建设的合力没有完全形成，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思政课建设的氛围不够浓厚。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思政课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必须切实增强办好思政课的自信，全面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

2. 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党对思政课建设的全面领导，把加强和改进思政课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二是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三是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落实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要求，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四是坚持思政课在课程体系中的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作用，统筹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建设，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建设形成协同效应。五是坚持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思政课教师队伍，积极为这支队伍成长发展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六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注重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全面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

二、完善思政课课程教材体系

4. 整体规划思政课课程目标。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引导学生立德成人、立志成才，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大学阶段重在增强使命担当，引导学生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争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高中阶段重在提升政治素养，引导学生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认同。初中阶段重在打牢思想基础，引导学生把党、祖国、人民装在心中，强化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意识。小学阶段重在启蒙道德情感，引导学生形成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的情感，具有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美好愿望。

5. 调整创新思政课课程体系。加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思政课课程群建设。在保持思政课必修课程设置相对稳定基础上，结合大中小学各学段特点构建形成必修课加选修课的课程体系。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率先全面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博士阶段开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硕士阶段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本科阶段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专科阶段开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必修课。各高校要重点围绕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宪法法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设定课程模块，开设系列选择性必修课程。高中阶段开设“思想政治”必修课程，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开设“思想政治”选择性必修课程。初中、小学阶段开设“道德与法治”必修课程，可结合校本课程、兴趣班开设思政类选修课程。

6. 统筹推进思政课课程内容建设。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以政治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法治意识、文化素养为重点，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遵循学生认知规律设计课程内容，体现不同学段特点，研究生阶段重在开展探究性学习，本专科阶段重在开展理论性学习，高中阶段重在开展常识性学习，初中阶段重在开展体验性学习，小学阶段重在开展启蒙性学习。

7. 加强思政课教材体系建设。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建设，科学制定教材建设规划，注重提升思政课教材的政治性、时代性、科学性、可读性。国家统一开设的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全部由国家教材委员会组织统编统审统用，在教材中及时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最新研究进展。地方或学校开设的思政课选修课教材，由各地负责组织审定。研究编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导纲要，研究编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科技创新文化及总体国家安全观等进课程教材指南，编制中华民族古代历史和革命建设改革时期英雄人物、先进模范进课程教材图谱，分课程组织编写高校思政课专题教学指南，组织专家编写深度解读教材体系的示范教案，实施思政课优秀讲义出版工程，开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书单，建设思政课网络教学资源库。

三、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8. 加快壮大学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各地在核定编制时要充分考虑思政课教师配备要求。高校要严格按照师生比不低于 1:350 的比例核定专职思政课教师岗位，在编制内配足，且不得挪作他用，并尽快配备到位。制定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加强中小学专职思政课教师配备。各地要统筹解决好思政课教师缺口问题。各高校可在与思政课教学内容相关的学科选择优秀教师进行培训后充实思政课教师队伍，可探索胜任思政课教学的党政管理干部转岗为专职思政课教师机制和办法，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辅导员参与思政课教学。高校要积极动员政治素质过硬的相关学科专家转任思政课教师。采取兼职的办法遴选相关单位的骨干支援高校思政课建设。各地应对民办学校指派思政课教师或组建专门讲师团。制定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

9. 切实提高思政课教师综合素质。以培育一大批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为目标，制定思政课教师队伍培养培训规划，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及地方党校（行政学院）面向思政课教师举办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修班，办好“周末理论大讲堂”、骨干教师研修班，实施好思政课教师在职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专项计划。建强高校思政课教师研修基地，依托首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所在高校重点开展理论研修，依托高水平师范类院校重点开展教学研修，全面提升每一位思政课教师的理论功底、知识素养。建立一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学基地”，组织思政课教师在国内考察调研，在深入了解党和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养分、丰富思想。组织思政课骨干教师赴国外调研，拓宽国际视野，在比较分析中坚定“四个自信”。完善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学校三级培训体系。本科院校按在校生总数每生每年不低于 40 元，专科院校按每生每年不低于 30 元的标准提取专项经费，用于思政课教师的学术交流、实践研修等，并逐步加大支持力度。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的政论、时政节目要积极推出优秀思政课教师传播理论成果，展示综合素质，增强社会影响

力。

10. 切实改革思政课教师评价机制。严把政治关、师德关、业务关，明确与思政课教师教学科研特点相匹配的评价标准，进一步提高评价中教学和教学研究占比。各高校在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工作中，要单独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别，校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委员会要有同比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家。按教师比例核定思政课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各类岗位占比，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岗位比例不低于学校平均水平，指标不得挪作他用。要将思政课教师在中央和地方主要媒体上发表的理论文章纳入学术成果范畴。实行不合格思政课教师退出机制。

11. 加大思政课教师激励力度。增强教师的职业认同感、荣誉感、责任感，把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中的优秀分子纳入各类高层次人才项目，在“万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四个一批”等人才项目中加大倾斜支持力度。各地要因地制宜设立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岗位津贴，纳入绩效工资管理，相应核增学校绩效工资总量。要把思政课教师作为学校干部队伍重要来源，学校党政管理干部原则上应有思政课教师、辅导员或班主任工作经历。党和国家设立的荣誉称号要注重表彰优秀思政课教师，教育部门要大力推选思政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等先进典型。对立场坚定、学养深厚、联系实际、成果突出的思政课教师优秀代表加大宣传力度，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12. 大力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注重选拔培养高素质人才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教育教学，统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构建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本硕博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提前批次录取或综合考核招生等方式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科生，给予推免政策倾斜鼓励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科生攻读硕士学位，采取硕博连读或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方式加强培养。深入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养专项支持计划”，专门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并逐步按需增加招生培养指标。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政治思想工作，加大发展党员力

度，提高党员发展质量。

四、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13. 加大思想性、理论性资源供给。进一步建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高校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为重点建设学科，为思政课建设提供坚实学科支撑。深入研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提供多角度学术支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领航作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根据需求逐步增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支持有关高校联合申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组织思政课教师及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及时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14. 加大思政课教研工作力度。建立健全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一体化备课机制，普遍实行思政课教师集体备课制度，全面提升教研水平。遴选学科带头人担任各门课集体备课牵头人，学校领导干部要积极支持和主动参与。建立思政课教师“手拉手”备课机制，发挥思政课建设强校和高水平思政课专家示范带动作用。加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建设，完善思政课教师网络备课服务支撑系统。建立纵向跨学段、横向跨学科的交流研修机制，深入开展相邻学段思政课教师教学交流研讨。推动建立思政课教师与其他学科专业教师交流机制。大力推进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提升思政课教师信息化能力素养，推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政课教学中应用，建设一批国家级虚拟仿真思政课体验教学中心。

15. 切实加强思政课课题研究和成果交流。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等设立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开展思政课教学重点难点问题 and 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等研究，逐步加大对相关课题研究的支持力度。各地要参照设立相关项目并给予经费投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成果学术阵地建设，首批重点建设10家学术期刊和若干学术网站，支持新创办一定数量的思政课研究学术期刊。制定思政课教师发表文章的重点报刊目录，将《人民日报》、

《求是》、《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媒体及地方党报党刊列入其中。委托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分片建立高校思政课教学创新中心，设立一批思政课教学质量监测基地。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单列思政课专项，每2年开展1次全国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定期开展优秀思政课示范课巡讲活动。打造一批思政课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探索建设融媒体思政公开课，推动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16. 全面提升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水平。强化“马院姓马、在马言马”的鲜明导向，把思政课教学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基本职责，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政课作为重点课程加强建设，在发展规划、人才引进、公共资源使用等方面给予马克思主义学院优先保障。建好建强一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和示范性马克思主义学院，依托有条件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一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工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上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全面推动各地宣传、教育等部门共建所在地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实施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培养工程，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领导班子建设。

17. 整体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和中小学学科德育。深度挖掘高校各学科门类专业课程和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体育、艺术等所有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解决好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发挥所有课程育人功能，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建成一批课程思政示范高校，推出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选树一批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建设一批高校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五、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

18. 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思政课建设主体责任。地方各级党委要把思政课建设作为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标志性工程摆上重要议程，党委常委会每年至少召开1次专题会议研究思政课建设，抓住

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和完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领导班子成员联系高校和讲思政课特别是“形势与政策”课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每学期结合学习和工作至少讲1次课。各地要把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纳入思政课建设整体布局。思政课建设情况纳入各级党委领导班子考核和政治巡视。

19. 推动建立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带头抓思政课机制。加强和改进高校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学生工作，推动高校领导干部兼任班主任等工作，建立健全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及职能部门力量深入一线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服务学生发展的制度性安排。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作为思政课建设第一责任人，要结合自身学科背景和工作经历，带头走进课堂听课讲课，带头推动思政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高校党委常委会每学期至少召开1次会议专题研究思政课建设，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每学期至少给学生讲授4个课时思政课，高校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每学期至少给学生讲授2个课时思政课，可重点讲授“形势与政策”课。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讲话等要鲜明体现党的教育方针、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思政课建设情况纳入学校党的建设考核、办学质量和学科建设评估标准体系。

20. 积极拓展思政课建设格局。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把思政课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教育部、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要牵头抓好思政课建设，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要指导抓好军队院校思政课建设。教育部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加强对不同类型思政课建设分类指导。有关部门和各地要保证思政课管理人员配备，确保事有人干、责有人负。强化中考、高考、研究生招生考试对学生学习思政课的指挥棒作用，将思政课学习实践情况等作为重要内容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探索记入本人档案，作为学生评奖评优重要标准，作为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参考。坚持开门办思政课，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与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

堂结合，鼓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就近与高校对接，挂牌建立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完善思政课实践教学机制。制定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汇聚办好思政课合力。加大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力度，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

选自《教育部网》2019-8-15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网信办、通信管理局、公安厅（局）、民政厅（局）、市场监管局、新闻出版局、“扫黄打非”办公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网信办、公安局、民政局、市场监管局，部属各高等学校，各直属单位，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网络中心：

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教育 APP，以下简称教育移动应用）是指以教职工、学生、家长为主要用户，以教育、学习为主要应用场景，服务于学校教学与管理、学生学习与生活以及家校互动等方面的互联网移动应用。近年来，教育移动应用快速发展、广泛应用，在提高教学效率和管理水平、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和兴趣发展、优化师生体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一些学校出现了应用泛滥、平台垄断、强制使用等现象，一些教育移动应用存在有害信息传播、广告丛生等问题，给广大师生、家长带来了困扰，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为引导和规范教育移动应用有序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教育信息化的驱动引领作用，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办好网络教育，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引导教育移动应用健康有序发展，为广大师生营造健康、有序、安全的网络空间和学习环境。

（二）基本原则

科学施策、分类引导。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管理与服务、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分类引导不同教育阶段和类型、不同用户群体、不同功能用途的教育移动应用，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问题导向、标本兼治。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进行规范。开展专项行动治理乱象，建章立制规范管理，提质增效支撑发展，综合施策打好组合拳。

多方参与、协同联动。以构建常态化的治理体系为关键，建立政府管理、企业履责、专家献策、学校把关、家长监护、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等多主体参与、职责明晰的综合协同治理体系。

（三）工作目标

全面治理教育移动应用乱象，补齐监督短板，规范全生命周期管理，提高开发供给质量，营造优良发展生态，促进教育移动应用有序健康发展。2019年底，完成教育移动应用备案工作。开展教育移动应用专项治理行动，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2020年底，建立健全教育移动应用管理制度、规范和标准，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初步建成科学高效的治理体系。

二、提高供给质量

（四）建立备案制度。教育移动应用提供者应当在取得 ICP 备案（涉及经营电信业务的，还应当申请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备案的证明、等级测评报告后，向机构住所地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教育业务备案，登记单位基本信息和所开发的教育移动应用信息。已备案的教育移动应用提供者上线新应用前，应当在备案单位更新相关信息。教育部制定备案办法，明确备案流程和内容，依托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为备案登记工作提供信息化支撑，汇总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信息，并向社会提供查询渠道。

（五）加强内容建设。教育移动应用提供者呈现的内容应当严

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党的教育方针，体现素质教育导向，呈现的广告应当与提供的服务相契合。以未成年人为主要用户的教育移动应用应当限制使用时长、明确适龄范围，对内容进行严格把关。鼓励以高校师生为主要用户的教育移动应用增强优质网络教育资源供给能力，成为加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具备论坛、社区、留言等功能的教育移动应用应当建立信息审核制度。面向各教育阶段实施培训的教育移动应用应当对提供服务的主体进行审核、登记，其中：在校外线上培训机构实施学科类培训的人员应当取得教师资格证；聘用外籍人员实施培训的应当审查教学资质、学历和能力，并严格落实国家相关要求。

（六）规范数据管理。教育移动应用提供者应当建立覆盖个人信息收集、储存、传输、使用等环节的数据保障机制。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对注册用户进行身份信息认证。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未成年人信息应当取得监护人同意、授权。不得以默认、捆绑、停止安装使用等手段变相强迫用户授权，不得收集与其提供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与用户约定，不得泄露、非法出售或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七）保障网络安全。教育移动应用提供者应当落实网络安全主体责任，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应对网络攻击，保障系统的平稳、安全运行。教育移动应用和后台系统应当统一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求。应用商店等移动应用分发平台提供者应当加强教育移动应用上架审核管理，建立开发者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制度，对教育移动应用开展安全审核，及时处理违法违规教育移动应用。鼓励教育移动应用提供者参加网络安全认证、检测，全面提高网络安全保障水平。

三、规范应用管理

（八）落实主体责任。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是本单位自主开发的教育移动应用的主管单位和选用第三方教育移动应用的责任单位，应当加强统筹管理，明确职能部门归口，将教育移动应用、公众号和小程序等移动互联网平台纳入本地区、本单位的重要议事日

程予以部署。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开发谁负责、谁选用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教育移动应用管理责任体系，切实维护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

（九）建立推荐机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地方实际，会同网信等职能部门探索本地区教育移动应用的推荐机制，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组织开展教育移动应用的评议，形成推荐名单并向社会公开，同时报教育部。推荐名单应保证质量，并保持动态更新。鼓励通过第三方评估，组织对教育移动应用的合法合规、功能性能、安全保障等方面进行检测，对教育移动应用呈现的内容进行检查，为推荐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十）健全选用机制。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制定教育移动应用的选用制度。选用应当充分尊重教职工、学生和家长的意见，并严格选用标准、控制数量，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负担。确定选用的教育移动应用应当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备案。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学校集体决策选用的教育移动应用，不得要求学生使用。中小学学习类教育移动应用应当落实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双审核”制度；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地方实际结合推荐制度简化审核流程。

（十一）规范进校合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规范教育移动应用的进校管理。作为教学、管理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教育移动应用，不得向学生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不得植入商业广告和游戏。推荐使用的教育移动应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不得与教学管理行为绑定，不得与学分、成绩和评优挂钩。对于承担招生录取、考试报名、成绩查询等重要业务的教育移动应用，原则上应当由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自行运行管理。确需选用第三方应用的，不得签订排他协议，或实际由单一应用垄断业务。鼓励高校联合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优化公共服务。

（十二）促进整合共享。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创新教育资源供给模式，探索通过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汇聚优质教育资源，集成各类应用，使网络学习空间成为教育移动应用的主要入口。面向师生提供管理和服务的教育移动应用应当整合为“互

联互通、业务协同、信息共享”的综合性教育移动应用。鼓励教育移动应用将收集的机构、师生信息与国家基础数据库进行统一校验，并统一汇聚至国家教育基础数据库。

四、健全监管体系

（十三）加强行业规范。教育移动应用提供者应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设置便捷的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理投诉。应用商店等移动应用分发平台提供者应当落实监督责任，健全资质核验、内容审核，配合进行适龄提示管理，并将教育业务备案作为上架应用商店的重要条件。鼓励移动终端提供者与家长监护提供技术支撑，提供未成年人监管功能。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制定行业公约，建立行业信用评价体系和服务评议制度，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十四）建立协同机制。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的监管机制。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负责教育移动应用治理工作，负责统筹协调，指导和监督学校落实主体责任，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治理。网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公安部门依据职责重点做好教育移动应用提供者、应用商店等移动应用分发平台提供者、移动终端制造商的监管工作。新闻出版部门重点做好教材、教辅等网络出版物的监管工作。民政部门重点做好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工作。市场监管部门重点做好线上盈利性教育机构的登记管理，依法查处违规收费，虚假、违法广告等行为。公安部门重点做好打击整治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十五）拓展监督渠道。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专业机构、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合作，通过技术检测和人工查看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常态化的监测预警通报机制。通过家长委员会，满足家长对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知情权、评议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引导家长履行监护责任，通过加强家庭交流互动、设置移动终端限制等方式，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教育移动应用。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全面掌握教育动态，及时受理投诉建议，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切实解决群众痛点难点问题。

（十六）加强考核问责。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教育移动应用的选用退出机制、负面清单和黑名单制度，推动将黑名单信息

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按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教育督导部门应当将教育移动应用治理情况纳入对下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估和对学校的综合督导评估。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教育移动应用治理纳入网络安全责任制等相关考核。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予以约谈、通报。对因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

五、加强支撑保障

（十七）加强组织领导。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将引导规范教育移动应用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宣传、“扫黄打非”、网信、电信、公安、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共同参与的部门协同机制，制订工作方案，明确职责分工、时间节点、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建立本地区的教育移动应用重点任务台账，统筹协调校外线上培训机构治理等重点工作，监督指导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十八）健全制度规范。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完善教育移动应用的备案、推荐、选用、监督检查等制度，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机制。健全教育移动应用评估、监测、检查、防护等技术规范，推进教育移动应用治理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组织行业专家和相关企业共同完善教育移动应用的标准，规范程序开发、运行管理等环节，提高教育移动应用的服务质量和保障水平。

（十九）提升信息素养。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组织管理和技术人员培训，将规范教育移动应用管理作为重要内容，切实提高管理水平和保障能力。同时，应当加强宣传引导和教育，以开学教育、网络安全宣传周等活动为契机，培养在校师生科学的使用习惯；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专题报告等形式，促进家长树立正确的用网观念，全方位地提高广大师生、家长的信息素养。

（二十）落实工作保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教育移动应用管理的经费支持，保障备案推荐、监测评估、监督检查等重点任务开展。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利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和国家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为教育移动应用治理工作提供信息化支撑，探索“政府统筹引导、企业参与建设、学校购买服务”的教

育移动应用供给机制，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应用服务。

选自《教育部网》2019-9-5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 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完善学校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理机制，形成依法依规、客观公正、多元参与、部门协作的工作格局，为学校（含幼儿园）办学安全托底，解决学校后顾之忧，维护老师和学校应有的尊严，保护学生生命安全，根据教育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等有关规定，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健全学校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制

1. 着重加强学校安全事故预防。各级教育部门要依法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督导、检查，会同、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学校校舍、场地、消防、食品安全和传染病防控等事项的监管，指导学校完善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完善学校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和责任体系，健全问责机制。各级各类学校要树立预防为先的理念，落实安全标准，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安全风险排查和防范机制，压实安全责任，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法治教育、生命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并严格执行学校教职工聘用资质检查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安全风险，杜绝责任事故。健全学校安全隐患投诉机制，对学生、家长和相关方面就学校安全存在问题的投诉、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办理回复。

2. 规范学校安全事故处置程序。各级教育部门要指导、监督学校健全安全事故处置机制，制定处置预案、明确牵头部门、规范处置程序，完善报告制度，提高工作规范化、科学化、专业化水平。

安全事故发生后，学校应当立即启动预案，及时开展救助。发生重大事故，要建立由学校主要负责人牵头的处置机制，必要时由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学校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牵头处理。学校应当建立便捷的沟通渠道，及时通知受伤者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告知事故纠纷处理的途径、程序和相关规定，主动协调，积极引导以法治方式处置纠纷。学校要关心受伤者，保障受伤者及其监护人、近亲属的知情权和依法合理表达诉求的权利。

3. 健全学校安全事故处理的法律服务机制。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组织法律援助机构依法为符合条件的学校安全事故受伤者提供法律援助，指导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等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指导律师做好代理服务工作，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表达意见，合理提出诉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学生权益法律保护中心，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聘请法律专业服务机构或人员，为学生提供法律服务。纠纷处理过程中，需要鉴定以明确责任的，由双方共同委托或者经当事人申请，由主持调解的机构、组织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4. 形成多元化的学校安全事故损害赔偿机制。学校或者学校举办者应按规定投保校方责任险，有条件的可以购买校方无过失责任险和食品安全、校外实习、体育运动伤害等领域的责任保险。要通过财政补贴、家长分担等多种渠道筹措经费，推动设立学校安全综合险，加大保障力度。要增强师生和家长的保险意识，引导家长为学生购买人身保险，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予以补贴。学校可以引导、利用社会捐赠资金等设置安全风险基金或者学生救助基金，健全救助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学校安全赔偿准备基金，或者开展互助计划，健全学校安全事故赔偿机制。

二、依法处理学校安全事故纠纷

5. 健全学校安全事故纠纷协商机制。学校安全事故责任明确、各方无重大分歧或异议的，可以协商解决。协商解决纠纷应当坚持自愿、合法、平等的原则，尊重客观事实、注重人文关怀，文明、理性表达意见和诉求。学校应当指定、委托协商代表，或者由法治副校长、学校法律顾问等专业人员主持或参与协商。协商一般应在

配置录音、录像、安保等条件的场所进行。受伤害者亲属人数较多的，应当推举代表进行协商，代表人数一般不超过5人并相对固定。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的，应当签署书面协议。推动学校建立专业化的安全事故处理委员会，统筹学校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

6. 建立学校安全事故纠纷调解制度。教育部门应当会同司法行政机关推进学校安全事故纠纷调解组织建设，聘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治副校长、教育和法律工作者等具备相应专业知识或能力的人员参与调解。建立由教育、法律、医疗、保险、心理、社会工作等方面专业人员组成的专家咨询库，为调解工作提供支持和服务。市县两级行政区域内可根据需要设立学校安全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对学校难于自行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安全事故纠纷实现能调尽调。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会同教育部门、人民法院加强对学校安全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帮助完善受理、调解、回访、反馈等各项工作制度，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和业务培训，确保调解依法、规范、公正、有效进行。地方教育部门根据需要可以直接组织行政调解。区域内的高等学校可以加强合作，联合建立事故纠纷调处机制。

7. 依法裁判学校安全事故侵权责任。人民法院对起诉的学校安全事故侵权赔偿案件应当及时立案受理，积极开展诉讼调解，对调解不成的，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参照《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规章，明确划分责任，及时依法判决；对学校已经依法履行教育、管理职责，行为无过错的，应当依法裁判学校不承担责任。诉讼调解、裁判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双方权利，杜绝片面加重学校赔偿责任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加强审判指导。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应当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并做好判后释疑工作。

8. 杜绝不顾法律原则的“花钱买平安”。学校安全事故纠纷处理过程中，要坚守法律底线，根据事故客观事实和法律法规规定，明确各方责任。责任认定前，学校不得赔钱息事。经认定，学校确有责任的，要积极主动、按标准依法确定赔偿金额，给予损害赔偿，不得推诿塞责、拖延不办。学校负责人或者直接管理者有责任的，

学校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依规及时处理、严肃问责。学校无责任的，要澄清事实、及时说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纠纷处理。坚决避免超越法定责任边界，片面加重学校负担、“花钱买平安”，坚决杜绝“大闹大赔”“小闹小赔”。原则上，公办中小学、幼儿园人身伤害事故纠纷涉及赔偿金额请求较大的，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等方式解决。各地可以根据实际，规定公办中小学校、幼儿园协商赔偿的限额。

三、及时处置、依法打击“校闹”行为

9. 及时制止“校闹”行为。学校安全事故处置过程中，如发生家属及其他校外人员实施围堵学校、在校园内非法聚集、聚众闹事等扰乱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秩序，侵犯学校和师生合法权益等“校闹”行为的，学校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提供当事方人数、具体行为、有无人员受伤等现场情况，并保护好现场，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调查取证等工作。公安机关到达前，学校保卫部门可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相关人员进入教育教学区域，防止其干扰教育教学活动。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维持现场秩序，控制事态，协助有关部门进行疏导劝阻，防止事态扩大。对现场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果断制止，对涉嫌违法犯罪人员依法查处。

10. 依法惩处“校闹”人员。实施下列“校闹”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予以处罚：（1）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2）侵占、毁损学校房屋、设施的；（3）在学校设置障碍、贴报喷字、拉挂横幅、燃放鞭炮、播放哀乐、摆放花圈、泼洒污物、断水断电、堵塞大门、围堵办公场所和道路的；（4）在学校等公共场所停放尸体的；（5）以不准离开工作场所等方式非法限制学校教职工、学生人身自由的；（6）跟踪、纠缠学校相关负责人，侮辱、恐吓教职工、学生的；（7）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管制器具进入学校的；（8）其他扰乱学校教育教学秩序或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的行为。

“校闹”行为造成学校、教职工、学生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被侵权人依法追究“校闹”人员侵权责任的，应当予以支持。同时，可

以通过联合惩戒机制，对实施“校闹”、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员实施惩戒。

11. 严厉打击涉及“校闹”的犯罪行为。实施“校闹”行为涉嫌构成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等，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公安机关要依法及时立案侦查，全面客观地收集、调取证据，确保侦查质量。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依法批捕、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加快审理进度，在全面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准确定罪量刑。对故意扩大事态，教唆他人实施针对学校和教职工、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以受他人委托处理纠纷为名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行为的，依法从严惩处。

师生、家长或者校外人员因其他原因在校内非法聚集、游行或者实施其他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行为的，参照上述规定予以处置。

四、建立多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

12. 加强学校及周边安全风险防控。各地要加强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在城镇幼儿园、中小学周边全面实行学生安全区域制度。教育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机关指导学校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应对机制和警校联动联防联控机制，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置能力。公安机关要加强校园及周边警务室建设，加强校园周边巡逻防控，及时受理报警求助。

13. 有效应对涉及学校安全事故纠纷的舆情。学校要做好安全事故的信息发布工作，按照规定主动、适时公布或者通报事故信息；在处置预案中明确接待媒体、应对舆情的部门和人员，增强舆情应对的意识和能力。对恶意炒作、报道严重失实的，学校要及时发声、澄清事实。对有较大影响的安全事故事件，属地教育部门应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会同相关部门做好舆情引导工作。对于虚假报道引起社会不良影响的，学校应当向有关部门反映或提起诉讼，追究其侵权责任。

14. 营造依法解决学校安全事故纠纷的社会氛围。推动学校安全法律制度建设，鼓励各地制定或修改、完善学校安全方面的地方性

法规。司法行政机关要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强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培养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推动形成依法理性解决学校安全事故纠纷的共识。要通过家长学校、家长委员会等多种方式拓宽学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的渠道，加强对学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法治宣传，形成和谐家校关系。学校要切实树立依法治校、依法办学理念，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不得为防止发生安全事故而限制或取消正常的课间活动、体育活动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

15. 建立学校安全各部门协调机制。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保障学校安全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与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地方教育部门应当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建立联席会议等工作制度，定期互通信息，及时研究解决问题，共同维护学校安全，切实为学校办学安全托底，解除学校后顾之忧，保障学校安心办学、静心育人。

各地可以结合实际，制定贯彻实施本意见的具体办法。

选自《教育部网》2019-8-20

★教育视点★

铸魂育人成为教育界的行动自觉

去年举行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归根结底就是铸魂育人、立德树人，就是要引导学生增强“四个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近一年来，全国教育系统紧

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牢牢抓住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根本保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行动，坚持“六个下功夫”，着力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坚持改革创新，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理直气壮开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使铸魂育人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行动自觉。

铸魂育人成为教育界的行动自觉，首先体现在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中小学到高校，通过教材编写、课程方案改革以及开展理论学习、典型示范、志愿宣读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让学生入脑入心。

铸魂育人成为教育界的行动自觉，体现在近一年来，各级各类学校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行动，努力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我们看到，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带头抓思政课落实在了制度上、行动上，他们带头走进思政课堂听课讲课成为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央视的《开学第一课》以“国旗下的讲述”为内容主线，邀请95岁高龄的白公馆脱险志士郭德贤、澳门濠江中学校长尤端阳等，为孩子们讲述了5个与国旗有关的动人故事，给中小學生带来了一堂新颖生动、真挚感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公开课。全国各地中小学纷纷把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开学典礼主题和开学第一课的重要内容，从“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到“领土一点都不能少”，再到向牺牲的先烈致敬，爱国毫无悬念地成为高频词，“三全育人”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崭新局面。

铸魂育人成为教育界的行动自觉，体现在近一年来，各级各类学校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它不仅是知识传授的平台和载体，更是价值引领的主渠道和主阵地，直接影响着学生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近一年来，各级各类学校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抓住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扎实有效措施。各级各类学校坚持“八个相统一”，

不断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努力探索互动式、启发式、引导式、讨论式、自主式、情景模拟等教学方式，坚持开门办思政课，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与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相结合，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努力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亲和力，不断提高思政课实效。各地在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上不断亮出实招，从提升待遇到加强培训，从调整结构到鼓励创新，取得突出成效。思政课越来越受学生欢迎，有一线教师深有感触地说：“与学生‘打成一片’才能‘影响一片’，只有互动起来、参与进来，课堂才不枯燥，学生才有获得感。”

铸魂育人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面向未来，各级各类学校要继续在实践中多一些创新，在探索中多一些担当。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让学生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教育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踏踏实实修好品德，努力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进一步成为我国教育界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

选自《中国教育报报》2019-9-6

顶层设计为教育落下重要先手棋

全国教育大会召开近一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以制定出台政策文件为牵引，加紧推进顶层设计，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2018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抓住了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痛点和难点，明确了新时代学前教育的定位；2019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对2035年以前的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划；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就推进普通高中教育教学改

革、全面提高普通高中教育质量进行了系统设计和全面部署；201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印发，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第一个聚焦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文件；201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学校思政课的高度重视。

有法学家认为：制度之治是最理想的治理模式，规则文明是最先进的文明形态。全国教育大会以来，教育政策制定工作推进力度之大、质量之高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教育发展顶层设计日臻完善、质量效益持续提升、政策落实有序推进。

顶层设计把教育事业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新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形势下，教育对各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全国教育大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教育放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放在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具体到贯彻落实方面，做到了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上、财政资金投入上、公共资源配置上优先保障和满足教育，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顶层设计把教育改革创新引向深入。一系列教育政策文件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教育改革创新的高度重视，充分彰显了教育“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要地位，为新时代教育工作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纵览这些政策文件，并不是单纯以量取胜，而是具有非常突出的针对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通过顶层设计，推动我国教育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顶层设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的教育问题。当下，教育是民生的头等大事，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顶层设计切实做到了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使教育改革成果更好地惠及了广大人民群众。例如，近年来学前教育深深困扰广大人民群众，入园难、入园贵、监管弱等一系列问题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为了推动学前

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顶层设计进一步强调了学前教育坚持公益普惠的基本方向，有力地回应了老百姓对公平优质学前教育的热切期盼。

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文件和制度的密集出台，使教育工作的顶层设计更加完善。近一年来，各级各地政府不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努力工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具体可行的配套措施，使得全国教育大会的各项指示精神得以有效落地，并逐步取得成效。眼下，各地各学校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和攻坚克难、拼搏奋进的行动姿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遵循教育规律，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选自《中国教育报》2019-9-5

管培俊：为促进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化支持

——在第十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第四届学术年会开幕式上致辞

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出席第十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第四届学术年会。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开局之年，也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宏伟目标的奠基之年。本届年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新形势下的中外合作办学”为主题，交流经验，研讨学术，对于促进中外合作办学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东省，专门视察了暨南大学，提出“擦亮金字招牌”、坚持立德树人、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又由暨南大学具体承办召开第十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意义更加特别！我谨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各位代表的热情参与表示衷心感谢和热烈欢迎！对广东省教育厅、厦门大学、暨南大

学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合作表达真诚的谢意！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就是要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总结提炼学会 36 年来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办会宗旨、发展理念、核心任务、专业布局等八个方面的学会发展战略构想。努力把学会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高等教育现代学术社团。这个发展战略构想，成为学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基本遵循，构成了学会工作的根本大纲、总体思路和长远规划。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重要分支机构，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成立以来，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需要，大力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积极发挥智库功能和咨政咨教作用，持续开展高水平课题研究，召开系列高层次学术研讨会，高质量编辑出版《中外合作办学月报》，多次承担教育部相关司局委托任务，成绩可圈可点。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具体承担了教育部国际司委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重大课题，在学会统筹和有关各方大力支持下，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圆满完成了课题任务并起草了《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文本。这一研究成果为我国高校更好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教育部有关部门意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拟于近期发布。相信这一重要研究成果在推动国家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及其分支机构作为高端智库在建言咨政方面的一个优秀案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促进“双一流”建设和高等教育内涵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与世界高水平学校的交流合作。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宝贵经验需要不断总结，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规律和独特的办学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相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结合这次会议的主题，我讲以下几点意见，与大家交流。

一、切实加强中外合作办学体制机制研究。中外合作办学是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办学经验的新探索，又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新实践。中外合作办学不是简单的给学校改个带洋味的名字，也不只是引进外国教授、开出用外语讲授的课程，而是要从办学体制机制上下功夫，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要坚守中国特色。这就需要我们切实加强中外合作办学体制机制研究，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大胆借鉴吸收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需要我们立足国情，以我为主，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大学的根本前提下，借鉴国际经验，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指导新的办学实践。

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加强党的建设，是做好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工作的根本保障。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切实把党的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将党对高等教育的全面领导贯穿中外合作办学的始终。针对中外合作办学中师生国际交流频繁等特点，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如何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材建设、教师和管理人员引进等方面严格把关，确保中外合作办学的正确方向。

二、切实加强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质量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生命线。中外合作办学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正确处理好中外合作办学规模、速度、质量、效益的基本关系，把质量提升作为做好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任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最终要体现在人才培养质量上。要深入研究如何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创新性思维、适应时代要求的关键能力；深入研究在引进国外大学好的课程和教材的同时，如何处理好“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深入研究如何加强中外合作办学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

三、切实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法理问题研究。中外合作办学涉及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涉及到各国之间教育政策和法理层面的衔接，需要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加强理论研究。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中外合作办学也在逐步深化拓展。相关政策调整或新政策出台，办学机构、项目课程体系和内容的更新，都牵涉到许多复杂问题，需要我们加强理论和政策研究，为办学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多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要进一步发挥带头作用，以问题为导向，加强相关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着力构建中外合作办学的科学理论体系；积极参与政策研究咨询，通过提供政策研究、决策评估、政策解读、咨询报告、调研数据等，服务中外合作办学科学决策；加强理论队伍建设，涵育高端智库人才。

今天，有不少高校领导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负责人在座，我们愿与大家共勉，共同努力支持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探索。希望分会在新的工作起点上，全力打造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暨分会学术年会这一重要平台，更好服务新时代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服务于中外合作办学工作，力争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分支机构的标杆，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选自《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网》2019-6-25

瞿振元：知识生产视角下的学科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简称“双一流”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坚持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其实质是要求高校优化学科结构，突出建设重点，打造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办出特色、提升整体水平，目标是世界一流。但由于高校有意识地抓学科建设的时间不长，对学科建设规律的认识不够，学科建设能力不足，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矛盾，迫切需要在已有实践的基础上提升认知、探究规律、妥善处理。

一、知识生产视角下的学科观

在大学里，学科久已存在，但究竟怎样认识学科？近年来，一些学者分别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别敦荣认为：大学学科是围绕办学定位、教师和学生等三大因素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所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作为大学实现其功能的核心载体，学科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根据人才培养需要组织起来的专门的知识体系；根据科研发展要求所建构的知识范畴；根据社会服务需要所形成的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的知识领域。张德祥等认为，学

科有三层含义：知识形态的学科、知识的规训制度、知识的组织建制。学科知识生产模式正是在学科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学科知识体系、学科制度、学科组织的不同形态组合。这些观点都很有见地，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学科是因知识分类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校是培养人才和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当我们在说学科是知识体系的时候，就包括着作为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作为知识创新的知识体系和作为社会服务的知识体系这三类形态。从知识生产的视角看，也可以说这三种形态就是知识简单再生产、知识扩大再生产和学校知识生产的外延（继续）这样三个过程。

1. 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知识简单再生产的过程。作为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是所有高校都必须具备的，是学校人才培养体系的主体内容，是把一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培养成“高级专门人才”所需要的知识的总和。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所需要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需要开好思想政治教育课，外语要教，艺术教育、体育也要教，专业课程更在其内，这些广泛的知识组成了一个知识体系，通常被称为专业教育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相对比较成熟，在必要的更新之外，运行过程表现为知识简单再生产的过程，年复一年，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否认这种知识体系的学科性是不对的，因为它违反了“学科是知识体系”的一般逻辑判断。否认这种知识体系的学术性是有危害的，因为它会造成轻视教学、轻视人才培养的严重后果。

2. 科学研究的知识体系：知识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当定位于研究型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就要建立知识创新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往往和专业教学的知识体系并不完全重合，它常常是与以问题为导向、课题为载体的工作体系结合在一起的，知识领域也表现得更加专门化，结果表现为新知识的产生，是知识的扩大再生产。因此扩大再生产的知识体系和简单再生产的知识体系具有并不完全一样的特点和运行规律。现在高校中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与对这两种知识体系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不足有很大关系。

3. 社会服务的知识体系：学校知识生产体系的延续。社会服务是大学的重要职能。开展社会服务、解决现实问题，同样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往往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作用于学校的外部，是学校知识生产体系主要是扩大再生产的知识体系的延续，是校园知识生产的“溢出效应”。我们也应当承认这种知识体系的学术性。认为社会服务不具有学术性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直接服务社会的功能的发挥。

二、知识生产视角下的学科建设

学科是知识体系，学科建设就是知识生产的过程。“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科建设，要注意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知识创新的知识体系和社会服务的知识体系的三类形态知识体系的区别和联系，全面加强、全面建设。在知识生产的视野下，学校是一个知识生产部门，无论是知识的简单再生产，还是知识的扩大再生产和学校知识生产过程的外延，都是知识生产的常态过程，都应得到重视。其中，知识的简单再生产过程是最基本的过程。所以，抓学科建设，要全面抓，而且把最基本的知识简单再生产过程首先抓好，而不是只抓知识扩大再生产这一种过程。

1. 简单再生产的知识体系：需要不断维护、更新与发展的生命体。简单再生产的知识体系是比较成熟的知识体系，大部分的内容保持稳定不变，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不断更新，是一个需要维护、更新和发展的“生命体”，这正是学科学术性的表现之一，也是人才培养内容不断更新的一个缘由所在。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所做的新工程教育转型（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NEET），也许对认识知识简单再生产会有启发。美国的工程教育大体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二战”以前，美国的工程教育坚持“有用的知识”的教育观，推进从“经验范式”向“技术范式”转变，知识逐步系统化；“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强调工程的科学知识，工程教育向“科学范式”转变，知识体系偏向理论化。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MIT逐步认知到这种培

养模式导致学生的学理性增强，但脱离了工程实践，因此要回归工程实践，从而提出了 CDIO 教育模式，即要有构思 (Conceive)、有设计 (Design)、进而实现 (Implement) 和运作 (Operate)。这种教学模式在中国也实行了一段时间。汕头大学的顾佩华先生从加拿大带着这个理念回来，改革我们的传统工程教学方式，一百多所高校参与，做得很有影响。进入 21 世纪，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方兴未艾，产业变革与结构调整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在线学习、慕课、智慧学习等新的学习形式不断涌现，给工程教育活动的开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保持 MIT 在世界高等工程教育界的引领地位，MIT 于 2013 年初组建了特别工作组，负责对 MIT 未来工程教育发展方向进行研究，2014 年 8 月发布了《面向未来的 MIT 教育特别工作组全校调查报告》。2016 年 8-10 月，MIT 形成实施新一轮高等工程教育改革计划的构想。经过搜集世界各国工程教育改革资料、调研产业界需求、访谈校友及工程专业师生等研究与论证工作，于 2017 年 8 月启动了改革的新一轮计划 (2017-2020 年)，即 NEET 计划。这个改革项目负责人 Ed Crawley 就是 CDIO 的创始人。NEET 明确要以培养引领未来产业界和社会发展领导型工程技术人才为目标，强调要培养学生能够面向未来的新机器和新工程体，相应的教学要从现实取向转变到未来取向，从学科隔离到学科合作，从回归工程实践到回归工程教育的育人本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要变，教育思想要变，相应的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必须改变。尽管教学中的知识是成熟的，但内容的取舍和组织在改变。这正是知识简单再生产过程的特点。

MIT 进行 NEET 教学改革的思路，对我们深入开展教育改革是很有启发的。如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不是更应该从面向现在向面向未来转变，从学科分割向学科合作、学科交叉转变，从狭隘的专业技术教育向技术、社会和人文相结合的教育转变？要通过重新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和重新构建知识体系，突出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以正确的思维方法进行跨领域的知识

整合和创新的能力。这是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的重构，是教育教学的改革，是在现有学科基础上的变革，而不是建设新的学科。

2. 知识扩大再生产的知识体系：学科方向、人才队伍和工作平台至关重要。怎样建设知识扩大再生产的知识体系？首先需要明白新知识从哪里来。毛泽东曾经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对“双一流”建设高校来说，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就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实践。在这种伟大的实践中必将产生新的知识。这也是最有意义的知识扩大再生产。现在，高校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小、散、虚”的现象。

“小”，就是小题目、小打小闹、小富即安；“散”，就是分散用力、散兵游勇、形不成攻关合力、更谈不上协同创新；“虚”，就是脱离实际，虚无缥缈。“小、散、虚”已经严重制约高校形成强大的知识创新能力，严重制约高校知识扩大再生产的有效产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是凝练学科方向，聚焦国家重大需求、聚焦世界科技前沿、聚焦科技原始创新。在这个事关学科发展前途的问题上，学校领导和科学家的境界非常重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国家前进道路上的多种矛盾，面对众多民生问题，我们以什么样的心境去对待？我们应当经常想想国家的需要是什么，想想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责任是什么，而不能整天算计着排行榜上的名次。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必须凝练学科方向，应当想国家之所想，承接国家重大课题、重大项目，解决国家和地方的重大需求；应当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解决重大科技难题；应当有“摘星揽月”之志奋力冲击世界一流。因此，凝练学科方向的问题，是科学问题，但也有思想觉悟的因素。

汇聚人才队伍，是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现在，我们对人才工作确实是更加重视了。但是，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唯“帽子”的问题，对于现在还没有“帽子”却有真才实学的人重视不够；无序流动的问题，以高待遇诱惑人才，挖人墙角，对国家来说，流来流去还是那几个人；

重个人轻团队的问题，等等。我觉得，要特别注意进一步贯彻好“引育并举，以育为主”的人才工作方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扩大开放，积极引进人才，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今后还要大胆引进人才。如果说挖人才，就不要在国内挖来挖去，而要到国外去挖人才！“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中，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第一次提出“引育并举、以育为主”，非常重要！人才的培养，本来就是靠自己，培养的过程当然是开放的。人才培养靠外国，是不可能、不可靠、靠不住的。“双一流”建设任务之首就是建设一流师资队伍。要通过“选苗子、搭台子、压担子”，以育为主，造就宏大的人才队伍。

没有必要的工作平台，难以进行知识创新。现在的问题是：工作平台“小、低、重”，即体量小、低水平、重复建设。平台建设的这种状况与科研的“小、散、虚”相当“匹配”。真正体现以高校为主的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工作平台也还相当不足，更谈不上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作平台。对此，我们应当逐步加以改变。

总之，对知识的扩大再生产而言，学科方向、人才队伍和工作平台这三大建设是至关重要的。要紧紧抓好这三大建设，并且改进科研作风，从而显著提高“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知识生产能力，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

3. 大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延续：不断创新社会服务模式。社会服务是大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外延和继续，大学校园里的知识生产，如果停留于实验室，停止于论文或专利，很快就会变成僵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尽管在认识世界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在改造世界上却没有作用。因此，高校应当推动技术转让、成果转化等工作，使高校的知识生产过程得以延续，变成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活的、有用的知识，同时校园里的知识生产也产生了更大的“溢出”效益。但高校的人力、物力总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我们广泛吸纳社会的力量、用市场的机制来推动成果转化，为社会做出直接的贡献。

在如何开展社会服务上，中国农业大学现代农业科技小院的案例值得重视。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在河北省曲周县白寨乡成立第一个“科技小院”。这是建立在生产一线（农村、企业）的集农业科技创新、示范推广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科技服务平台。以研究生与科技人员驻地研究，零距离、零门槛、零时差和零费用服务农户及生产组织为特色，以实现作物高产和资源高效（双高）为目标，引导农民进行高产高效生产，促进作物高产、资源高效和农民增收，并逐步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和农业经营体制变革，探索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现今，已经成立了100多个科技小院，分布于全国23个省份，针对不同的农业种植类型为当地的农业进行全方位的服务。176名研究生先后在科技小院完成学业走向社会，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获得省市校及地方奖励252项；发表学术论文150篇，包括4篇发表在《NATURE》上、1篇发表在《SCIENCE》上、2篇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出版专著9部；培训农民20多万人次，技术示范上千万亩，扶持60多家合作社，30多家企业。这个案例成功地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整合在一起，创新了研究生培养模式，特别是把成果进农户、致富于农民和高水平论文发表在世界顶尖期刊上完美结合起来，真正做到“顶天立地”，把论文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这一经验很值得深入总结，而且应当鼓励有更多的社会服务模式的创新。

三、学科建设要遵循知识生产的逻辑

既然学科包括三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学科建设包括三种不同的知识生产过程，那也就意味着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抓学科建设。对于知识简单再生产的过程，即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的建设，前面已经有了较多阐述，这里着重讨论知识扩大再生产过程，即知识创新过程的几个问题。

1. 从跨学科到超学科：打破全面知识再创新的壁垒。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变着知识生产的方式。张德祥等人的研究表明：过去我们认为，传统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即以学科知识不断分化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发展到打破学科的内外部界

限，尝试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合作、融合，由此催生出跨学科知识生产模式。但是现在又有新的发展，即进一步发展到了超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超学科的核心思想是不同学科的学者与从业者一起工作去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是一种跳出纯粹的学术围墙，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高度，通过对学科知识与社会实践、个体认知实践的整合，构建集政府、产业、大学与社会公众于一体的创新生态系统，以全面的知识再创新来解决经济社会中的复杂问题。我认为，我们应当关注知识生产方式的发展，犹如我们常说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道理一样，知识生产的方式，包括人员的组织、资金的管理、平台的建设等等，都应当适合知识生产的不同情况，以适合的生产方式促进知识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在“双一流”建设中，有些高校和有些学科却是逆向而行的。如有些高校，一些人为了学科组织的眼前利益，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筑起无形的墙，在学校内部形成一个一个的“学科孤岛”，而不是日益茂盛的交叉融合发展的学科生态。某些评估和排行榜在助推学科之间隔离的加深。对此，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认识，采取得力的利益导向措施，冲破狭隘的利益藩篱，推动学科之间的交叉和知识的深度融合，促进跨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复杂问题的超学科解决方案。

2. 学科建设与学校建设：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学科建设与学校建设的矛盾。显然，学科建设是学校的局部，学校建设是学校的整体，学科建设和学校建设的关系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因此，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就是以局部带动全局。但是，全局不是局部的简单相加之和。局部和局部之间、局部和整体之间都是有矛盾的，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能否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形成良性互动的学科生态体系，是对学校领导水平的考验。一流学科点，特别是我们常说的以世界一流为目标的465个学科点，是国家对学校交办的重点建设任务。对学校来说，不仅应当完成好这个建设任务，而且应在学校整体建设中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当然，如果重点建设学科和学校的主

体学科是一致的，这个矛盾相对还好处理一些；如果不一致，这个矛盾就难处理一些；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会引起学校发展方向的偏移。

譬如，全国本科层次的师范院校共有 119 所，其中 49 所冠名大学，进入“双一流”建设行列的 10 所。但只有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有教育学的一流建设学科点，其他 8 所师范大学都没有；10 所师范院校所承担的重点建设学科共 28 个，大都是文理基础性学科，如物理、历史、地理等等。显然，这些学校不加强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对师范教育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长此以往可能会改变学校的师范教育的方向。在现行体制下，师范教育仍然是我国基础教育的支撑和保障。因此，正确处理好两者关系，建设校内良好的学科生态就显得非常重要，不仅影响学校自身发展，而且关系国家教育体系的发展。

农林高校的情况相对好一些。农林类共有 24 个学科点进入“双一流”建设。24 个学科点分布在 15 所大学，其中 9 所以农林命名的大学，6 所是综合性大学，如浙江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贵州大学、兰州大学、海南大学，还有中国海洋大学。9 所以农林命名的学校中，承担国家重点建设任务的学科点共 24 个，其中 17 个是农林类，7 个是非农林类。这些学校总体上还是农林学科点占主体。但即使是这样，仍然需要正确处理好学科建设和学校建设的关系。重点建设的学科，目标是冲击世界一流水平，是代表着学校在学科生态中的高峰，但并不能说它就是这所学校的整体。因此，一方面要把重点学科建设看作是国家交代的任务，认真完成好，还要接受验收；另一方面，要按照“统筹推进”的要求，全面考虑，抓好学科生态建设，以重点建设学科为龙头，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全面进步。

3. 建立鼓励变革的机制，推动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固然有高校自发的成分，也不能完全是自发的，而需要建立鼓励变革的机制。在这方面，有不少成功的案例。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说：我不大操心各个具体学科的事情，因为有教授们在操心；我操心的是跨学科的事情，因为教授们不

愿意合起来做事情，但是我有一笔钱把他们叫在一起做学科交叉的事情，使学校走在学科发展的前沿。这个校长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又如，20世纪90年代，清华大学王大中任校长那段时期，学校认识到社会面临人口、食物、资源、环境和卫生健康等方面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与生命科学密切相关。为此，清华大学决定以相当大的财力（学校“985工程”一期学科建设经费的1/5）集中投入于建立并加速发展生命科学学科群，并且注重发挥清华工科优势，促进生（命）、医（学）、工（程）的结合，很快成长为国内优秀学科群进而进入世界先进的行列。我们要尊重知识生产的逻辑，鼓励在基础学科有更多的自由探索，支持“由0到1”的研究；积极在工程和技术领域有更多的有组织科研和协同创新，努力取得大成果；支持在人文社科领域有更多的个性化创造和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咨议佳作。总之，要按照知识生产的逻辑，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学术管理制度，促进知识生产健康快速发展。

选自《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网》2019-9-3

★理论前沿：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成效是检验学科建设水平的根本标准

作者：佚名

大学的学科与人才培养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从学科形成机理看，由于学术研究的不确定性和学者自由研究的相对独立性，推动学者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向，为学科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学者的学术研究前沿往往代表了未来学科发展方向。但是，学术研究并非完全就是学科。因为，学科是在学者学术研究过程中，截取了相对成熟的学术研究成果，按照一定规则分类并转化成相对稳定的学术体系。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但不能完全等同。

从学术研究转变为学科需要具备相应的转化条件。一是社会对于这一研究领域或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二是相对集中的学术研究领域或者研究边界；三是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成熟的知识体系；四是具备了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五是形成了学科文化，包括学者的研究行为习惯、思维方式、情感价值取向、研究伦理规范等。这五个条件中，前四个条件是学术研究方向转化为学科发展方向的必要条件，第五个条件学科文化，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但是，学术研究与学科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因传播或传承知识的需要，学术研究需要相对成熟的学术体系、学术规范、学术研究方法，由此集合形成了学科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作为发现知识的主体，由于学者的闲逸好奇或社会需要的强烈驱动，学者总是在不断突破现有的学科体系和框架，站在学科前沿上开展学术创新，并推动着学科不断分化发展。所以，学科组织永远需要在引力与张力之间保持适当平衡。即，学科需要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从而在有限时间内将最成熟、最有意义和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传承给下一代。同时，学科又需要保持相对的开放状态，允许并鼓励学者在学科前沿、在跨学科之间自由探索，促进新兴学科发展。

由此可见，学术研究是学科形成发展的基础，学科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稳定的组织和资源保障。大学之所以存在学科，其根本目的和任务是把学术研究转化成为相对稳定的学术体系，进而依据教育目标将学术体系转化成知识教学体系，最终传承给下一代，并反过来又推动学术不断创新。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研究—学术体系—教学体系”就构成了完整的学科活动链条，其循环螺旋发展构成了学科的内在于运动规律。

学术研究与学科的辩证关系说明：大学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探索未知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把探索未知世界的学术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成果。大学学科建设的本质就是遵循学科自身发展规律，通过寻求构建合理的学科组织关系，促进和推动学者不断去探索、发现未知世界，并及时将探索未知世界的学术研究成果转

化为学术体系，最终转化成教学体系，落实到培养什么人身上。从这一意义上说，学科是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学科发展水平反映了大学人才培养的能力和水平。

当然，正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一样，人才培养成效和水平是检验学科建设水平的根本标准。因为，当大学的学术水平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时，越需要相对稳定的学科组织来传承、积累知识，为后续原创性、突破性学术研究积聚力量。相反，当学术研究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时，特别是当大学人才培养体系亟待需要创新时，就不能被固化的学科组织所捆绑，更不能被僵化的学科壁垒所阻碍。相反，需要大学从最为基础的学科层面，对学科体系进行釜底抽薪式的革新。

选自《光明日报》2019-9-3

“应试”评估不是学科建设的全部

厦门大学 邬大光 薛成龙

编者按

自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来，学科建设已经成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抓手。尤其是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束之后，以学科评估结果配置资源，成了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切入点。学科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学科评估牵动起高校方方面面的神经，深刻影响了高校的办学行为和工作重点。然而，学科到底是什么？学科评估究竟应该评什么？学科评估如何引领高校办学的价值取向？对于这些问题，作者认为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政策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回答好这些问题，既涉及“双一流”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也涉及学科评估能否持续发展，更涉及深层次的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和学术生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1. 大学为什么会存在学科

学科评估评什么？这首先涉及学科是什么，或者说大学为什么会存在学科？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特定的价值、属性和功能，学科也不例外。从不同视角看，对学科有着不同的理解。其一，学科是关于知识的分类。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基于探索真理的需要，必然要对知识进行不同程度的分类，这是学科存在的逻辑起点。其二，学科是学者研究领域的分类。大学中不同学者群体为了研究需要，形成了有一定差异性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范式，并以各自所认同的学术语言传播、交流学术研究成果，促使学者研究领域出现了多样化的类型划分，这就构成了学科的外在活动形式。其三，学科是高校学术组织的分类。一方面，基于知识分类和学者探求真理的需要，同一学者群体之间的不同学者，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其他学者发生联系，从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群体组织，学科由此变成了大学内部的组织分类。另一方面，作为传播知识的场所，大学为了知识传承，也需要分门别类进行授业，由此形成了大学分科（专业）进行人才培养。其四，学科是高校资源配置方式。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消耗资源，但资源的稀缺性与研究活动对资源需求无限性的矛盾，要求高校必须依托学科组织，集中有限资源开展最为有意义的研究活动。由此，学科演变成一种配置人、财、物等资源的基本方式。其五，学科是大学的管理手段。基于以上多方面的需要，高校很容易把学科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并以学科为抓手开展学科规划、学科建设以及学科评估等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学科从最初的知识分类功能进一步拓展为兼具行政管理职能。尤其是随着各种学科排行榜的兴起，学科管理功能进一步被扩大，并固化了学科组织性、工具性的管理特性。

由此可见，大学之所以存在学科，本质是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需要。学科是学者发现、传播知识这一活动而形成的“集合体”。在该“集合体”中，学者构成了这一学术活动的主体，发现和传承知识是学科的核心学术活动，也构成了学科的本体功能。资源配置与管理是维系学科活动的保障，也构成了学科的衍生功能。

2. 为什么评估大学学科

从我国学科建设的历程看，在早期学科建设中，由于学术水平相对落后，大学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学科组织体系，以便集中优势资源开展学术研究，并为未来的学术创新进行原始积累。特别是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通过学科评估选择部分学科进行重点建设就成了学科发展的重要策略。同时，学科评估也满足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学科建设的期待和需求：政府可以了解高校的办学效益和水平，为制定教育政策提供依据。高校可以了解学科发展水平和存在问题，以及下一步改进方向。社会民众可以了解不同高校的学科优势和专业优势，为学生报考学校、选择专业提供参考。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尽管学科评估有缺陷，但在社会上还是有较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这又反过来推动政府和高校把它当成资源配置的抓手。

学科评估应当包括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科学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这种评估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术活动（包括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是否满足了社会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需要？二是学科是否适应或促进了学术创新活动的需求，包括学科资源配置机制、学术创新活动的组织方式以及学术组织关系等等。但是，由于学术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全面综合地评估上述两个方面非常困难。在现实中，往往只能选择部分可测量、可操作的选项。在这种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涉及评估观测点的取舍问题。这种选择主要包括两个层次。其一，就学术活动本身，涉及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两个选项：前者易以经费、项目、论文、专著来衡量，具有显性的表现方式，往往比较易于评价；而后者由于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难于量化，具有隐性和滞后的特点，故难以评价，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高等教育难题。其二，就学科组织关系而言，涉及学者、资源、资源配置机制、学术创新活动组织方式的选择。同样，由于学科生产关系难于考察和评价，学科评估往往选择易于观测的师资队伍、办学硬件条件、科研平台数量等静态要素指标，而放弃了动态关系指标的考察。所以，学科评估本身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建设水平，但不是全部。

3. 陷入“应试”的大学学科建设

当下的学科评估没有反映学科建设的全部内涵，分析其原因，既与高校学科发展成熟度和对学科的理解有关，也与学科评估的技术方法有关，更与评估的价值取向有关，而首要问题是评估价值取向的选择。尽管这不是学科评估的初衷，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高校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陷入“应试”的泥潭，依据评估指标体系而不是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已经成为高校学科建设的路径依赖。

由此，科学研究在大学也就成为学科建设的代名词，科研水平成了学科建设水平的标志，科研成果尤其是大学排行榜上的位次，成了学科建设的GDP。“双一流”建设的提出，大学建设开始下移到学科层面，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但也出现了新问题。例如，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和高校把学科评估结果与各种利益绑定在一起，不同程度上绑架了学科建设导向，带来了大量的短视和功利行为：一是“抢帽子”，为了短时间内学科排名上升，互挖墙脚，助长了高校间人才大战，破坏了高校学术生态。二是“揭盖子”，评估间隔时间短，动不动就想揭锅盖，看看饭煮熟了没有，不利于高校静下心来进行长远的学科规划和思考。三是“挂牌子”，高校热衷于各种基地、平台、研究中心建设，而对于学科内在组织运行机制建设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四是“扎笼子”，学科评估强化不同学科间的领地保护意识，筑高学科藩篱，固化学科行政壁垒。五是“铺摊子”，学科评估的拼体量、拼数量做法，推动高校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博士生、硕士生指标等数量和规模的追求，忽视人才培养过程的育人质量。六是“丢卒子”，部分高校为取得“优异”成绩，舍卒保车，甚至不得不忍痛割去了原有的特色学科。七是“错位子”，学科评估过程的科研硬指标和人才培养的软指标，强化了高校重科研轻教学、重学术轻育人趋向。

需要承认，科研成果是呈现学科实力的表现形式，但并不是学科建设的全部，更不是学科建设的唯一标准，尤其不是高等教育的内涵。因为从大学发展的源头来看，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第一

产品，即拳头产品；科学研究是大学的第二产品，是大学发展的衍生品，是为了支撑大学人才培养而存在的。离开了人才培养的科学研究，大学的学科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也就虚化了学科建设内容。尽管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增加了人才培养指标权重，但由于人才培养难于量化评价，科研导向的趋向没有得到实质性改观。

参加过国内“双一流”大学本科评估的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埃里克·艾萨克说：“我相信中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实力在国际各种排名榜上会持续上升，但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不同步。当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人才培养将成为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的一流大学似乎还没有感受和认识到人才培养的压力，没有深刻体会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以及人才培养会给学科建设带来哪些好处。中国大学的硬件建设已经是世界一流，但在人才培养上还有很大差距。虽然许多大学都在强调厚基础、宽口径、跨学科、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理念，但在评估过程中无法看到有效的做法。”

4. 人才培养成为学科建设的短板

大学的存在，是源于人才培养，是基于人才培养，是着眼于人才培养，并不是基于学科和科研。脱离了人才培养的学科建设，不是真正的学科建设。否则，高校的学科建设就无法区别于科研机构。但是，在学科评估指标中，人才培养指标一直是软性指标。其原因如前所述，是由于人才培养指标难以量化。因此，无论人才培养指标权重多少，即便把人才培养指标放在第一位，都无法与科学研究和教师队伍的硬指标相抗衡，这就导致了学科评估成为了科学研究评估。学科建设由此也出现一些倒挂现象，即尽管学科科研指标很好，但在人才培养方面却有着明显的短板或洼地。厦门大学课题组对参加第四轮学科评估的部分高校进行了数据分析，发现有大量的“零数据”现象。例如，某高校有 152 个零数据，其中 102 个零数据集中在人才培养这个指标。还有一个高校出现了 200 余个零数据，其中 100 余个零数据出现在人才培

养这个指标。该数据既击中了我国“双一流”高校建设的软肋，也反映了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中的短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下学科评估的概念和做法，源于学位授权点评估，这种评估包括了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和水平评估。学位授权点是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重要载体，其核心是人才培养。但是具体评估过程中，学位授权点评估窄化为科研评估，并在现实环境中把科研评估泛化为学科评估，而原来最为核心的人才培养，在实施过程中被不断被弱化。特别是由于管理部门分割，作为人才培养的基础——本科教育在学科评估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由此看到我国大学的这两种主要评估的不平衡现象：我国启动较早的是本科教学评估，已经收到了一定效果。特别是2018年以来，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了“以本为本，建设一流本科”的呼吁，本科教育似乎受到了高度重视。但事实上，在学科评估的挤压下，一流本科建设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因为学科评估与资源配置高度相关，而本科教学评估与资源配置的关联性并不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重科研、轻教学”已经成为许多“双一流”高校难以扭转的问题，而学科评估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顽疾。部分管理部门在进行一流学科建设时，基本是依据大学排行榜或ESI、SCI等科研指标，而现有的大学排行榜几乎都是科学研究的排行榜。上述“零数据”现象说明，在现有学科评估体系导向下，高校学科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游离于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更多关注显性的科研成果、科研项目等科研指标和人才“帽子”指标，而对于如何把学科优势转化为队伍优势，把科学研究优势转化为教学改革研究优势，把科研成果优势转化为教学成果优势，缺乏应有的足够的关注。

5. 人才培养是学科的归宿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有3项基础性工作要抓好：第一，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第二，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第三，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这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高等教育的

内涵和本质，也阐明了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无论是一流大学建设还是一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始终是高校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质量和成效是检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根本标准，这也是学科建设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学科体系建设不能游离于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更不能凌驾于其上，学科体系是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支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是学科建设最为核心的内容。

毋庸置疑，由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距，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采取一系列“弯道超车”策略，组织实施包括985工程、211工程在内的系列重大工程。从实施效果看，在这些重大工程带动下，我国高等教育各项指标尤其科研指标在世界排行榜中显著攀升，少数大学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方阵。在此背景影响下，高校学科评估无论从评估价值导向还是指标体系设计以及评估效果看，无疑适应了这一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但是，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发展战略是一个阶段性发展策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这种发展策略必然面临着根本战略转移，实现这种战略转移意味着：高校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学科评估要从关注科研为重点转向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重点。

从高校学科建设内涵而言，就必须跳出现有学科评估体系要素的束缚，摒弃旧有学科建设的习惯，回归人才培养这一初心，回归到学科最初的知识传承创新功能，从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出发，重新审视学科建设的内涵与要义，并落实到高校教学体系建设、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建设以及教材体系建设等各个方面。与之相应，现有学科评估体系也必须进行及时改革，这种改革显然不是在原有学科评估体系框架内的修修补补，而必须从评估理念、价值取向、评估方法手段、实现技术路径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新。从现有评估现状看，当务之急首先是改变学科评估的价值导向，深入开展研究，把学科评估的评价标准聚焦人才培养，强化人才培养在学科评估整体指标体系的内容和权重，真正把立德树人成效形成可衡量、可观测、可评价的标准，把“软指标”

变成“硬要求”。其次，在实际评估过程中，要强化学科评估对高校内部评价机制的扭转作用，通过外部学科评估，引导高校改变在职称评聘、职务考核、激励奖励等方面过分强调“帽子、课题、成果、经费、奖项”等刚性指标，而把工作的重点落在如何把学科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把人才优势转化教学队伍优势，把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

还应当看到，大学学科建设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学科评估结果反映了一定阶段高校学科建设水平，但不是全部。对待学科结果的应用，也不能把过多的利益绑在学科评估上，放大学科评估的功能，更不能把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当成学科建设的全部。无论是政府或高校，都应当淡化、去除学科评估的各种附加杠杆，推动高校以平常的心态把学科评估工作的重心聚焦自我诊断、反馈以及持续自我改进，而不是简单的“填表”或“田忌赛马”式的博弈游戏上来。

可喜的是，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正在跳出原有的狭窄学科范畴，而从“学科群”层面组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学科建设，试图构建一种相互共生、伴生的学术新生态。这些做法既反映了大学对现有学科建设现状的不满，也反映了大学试图摆脱现有的学科建设的路径依赖。因为他们发现，在过去学科评估导向下形成的过于强大的行政管理功能、过于僵化的组织特性、过于固化的学科壁垒，已经束缚了大学的学术创新，也禁锢了人才培养的活力。面对即将到来的第五轮学科评估，就是要移除附加学科身上的过多衍生功能，回归到学科的本体功能，就是发现以及传承知识和人才培养的功能。

选自《光明日报》2019-9-3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北京师范大学 韩震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

动力，也应该成为激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为人民做学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真理的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初心使命的最好表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就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近代以来的落伍，使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状态，几乎落入丧失独立、任人宰割的境地。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同时我们也遭遇霸权主义来势汹汹的遏制与打压。面对极其有害的“文明冲突论”，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前无古人的实践，既承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也在与世界人民一起寻求着人类文明前行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梦想所造就的时代，必定是需要理论而且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必定是需要思想而且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要求。要加快构建真正不负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我们必须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回应人民的关切，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总结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阐释激扬中国发展进程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为人民提供学术精品、鸿篇力作，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就要不断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忘责任担当，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为研究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是理论服务实践的必有之义。学者不能只在书堆里打转转，应该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把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作为自己学术活动和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由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发现时代问题的敏锐度，这样才能有正视现实问题的清醒头脑、解决时代问题的自觉意识。树立问题意识，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就是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论的角度讲，就是要做到有的放矢，不讲空话，根据问题的性质思考工作的思路、办法和步骤。实际上，树立问题意识既有世界观的基础，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学术共同体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建立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协同机制，对社会亟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进行符合实际的探索，增强实际工作的有效性。只有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才能有效投身社会实践，扎实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还必须致力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和学术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摒弃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主要是发挥后发优势，通过借鉴别人的经验迅速追赶。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学术研究跟着别人的学术潮流跑，用舶来的理论解释一下中国的问题，似乎也能够应对，但是发展到今天，中国不可能再学着别人的样子又好又快地发展了，因为我们的实践越来越走在前边了。在新时代，如果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仍然依赖别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根本无法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倡导基于时代问题与实践活动的创新性思考，摒弃两种倾

向：一是“洋教条”，即完全根据西方的理论去设定和思考，根本不考虑中国实际的特殊性；二是“古教条”，即完全从古书中寻找原则方法，用过去的结论解决新时代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既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又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以系统性、专业性的要求，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着力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选自《新华网》2019-8-28

建立文学经济学学科的可行性

兰州大学 吴世奇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反映社会生活，表现心理活动的学科；经济学则是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规律的学科。从表面上看，二者似乎并没有多少关联，但若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及日常实践活动中来考察，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其实具有密切联系。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学科的细化及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成为两种相反相成的发展趋势。无论是文学还是经济学，都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产生了诸如文学人类学、文学地理学、文学社会学、行为经济学、体育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交叉学科。从历史发展及当下走势来看，文学与经济学也可融合为一门新的“文学经济学”学科。建立文学经济学学科具有充分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拓展解读视角

文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有特定的作家作品，也有国民经济的文学市场部分，还有联结二者的文艺政策与生产制度等诸多方面。文学经济学的研究能够开拓解读文学作品的新视角，促进文学作品意义增殖，还可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

美国学者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对小说何以能在18世纪的英国兴起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分析。他认为，当时英国中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发展壮大推动了小说普及。伊恩·瓦特指出，“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店主、独立的零售商和行政事务机关的雇员的数目以及他们的财产却骤然增多。他们日益提高的富裕程度或许把他们纳入了中产阶级文化的轨道……购买书报的人数的最实际增加或许是他们促成的，而不是总人口中陷于贫困的大多数人”。考察小说在18世纪英国兴起的深层原因，能够发现这与工业革命的发生关系密切，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进而推动了英国文学市场的发育。由此可见，文学作品被读者接受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在文学经济学视域中分析此类文学现象，可拓展解读作品的视角。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可视为对社会现实的“浓缩”和反映。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对巴尔扎克的小说给予高度评价：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无比精彩的现实主义历史”，“他汇编了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的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虽然文学不能机械地成为社会与时代的“传声筒”和“留声机”，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具有表现与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风貌的功能，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带有较强纪实性的非虚构叙事作品，可以成为探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宝贵资料。巴尔扎克的小说就是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

尽管许多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可能并没有反映特定时代及地域经济发展的主观动机，但由于经济活动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作家不可避免地会在作品中描写经济状况。这些描写可为经济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同时，这种跨学科研究也使文学作品的意义实现增殖。

更新分析方法

文学经济学具有特定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方法，就文学作品研究而言，从经济学规律出发有时能得出独到见解。例如，陈建华在《鲁迅〈肥皂〉解读——从商品的角度》一文中，从商品经济角度着手，侧重探讨鲁迅作品中的现代物质文明、女性、城市生活等话题，剖析鲁迅对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人性的思考，得出有别于之前许多研究者的结论，显示出较为独特的学术眼光。

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活动由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个要素组成。这四个要素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它们围绕作品这个中心形成一个有机的动态系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概括为社会再生产过程。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就是生产过程的不断重复和更新，它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

在文学活动及经济活动的要素中，我们能找出二者的交汇点，从而为建立文学经济学学科提供依据。例如，在文学活动中，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过程，就牵涉作品的出版、发行、传播等环节，从而与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换、消费产生联系。由此，作品和读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

反过来看，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换、消费等要素也影响着文学活动，对作家创作及读者阅读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中指出：“文学产品是多种社会、经济和文化过滤器对那些由作家推动而进入写作阶段的设想进行一系列筛选的结果。如果该设想在没有实施之前遭到出版商的拒绝，那它就会流产……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出版商对所有书籍都实行一种经济挑选的总标准。”在西方诸多经济学理论中，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影响深远。他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人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出版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符合出版商要求的文学作品才能更好地流通。同时，这

一现象也从反面提醒我们，文学作品的流通不能仅由经济因素决定，否则会对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因此，文学经济学研究为全面考察文学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途径。

转变研究范式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文学发展受经济影响加深。德国学者西奥多·阿多诺在其《启蒙辩证法》中提出了“文化工业”概念。虽然阿多诺主要用这一概念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及标准化现象，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学发展市场化的趋势。就当下中国文学市场的发展而言，文学参与经济活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作家作品的出版发行、作家作品的影视改编及基于文学创作的旅游经济发展。

近年来，随着网络文学异军突起，文学类图书的销售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火爆局面。“80后”网络小说家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在一年内销售了近400万册。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收益同样非常可观。近几年的热播影视剧，几乎均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并产生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收益。例如，根据刘慈欣同名科幻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票房收入高达46亿元。此外，文学对旅游经济的发展也有重要作用。一些著名作家生活过及经典作品提及的地方，如杜甫草堂、苏堤、滕王阁等，每年都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参观游览。

建立文学经济学的初衷主要是促进文学的繁荣，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文学与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社会文化语境也促使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考虑市场需求。文学经济学学科的建立，除了对文学、文化、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外，还能够带动相关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文学经济学并非将文学与经济学两个学科简单相加，这一学科的建立意味着将文学艺术与社会语境相结合，将文学文本与外部社会相联结，从而深化对文学创作、流通、接受和社会影响的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已有不少探讨文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成果，但并没有从学科建设层面讨论建立文学经济学学科的可行

性。我们认为，文学的发展需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但外部因素，特别是经济对文学的影响不一定是消极负面的。而从理论探讨和文学实践等方面着手，推进文学经济学研究，不仅能开创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也可使我们对文学活动的理解更为丰富和立体。

选自《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2019-8-20

★院校动态★

复旦大学：江南文化研究院基地揭牌

日前，由上海市青浦区与复旦大学共同设立的“江南文化研究院基地”揭牌。通过基地的设立，双方将协同推进江南文化学术研究，整合江南文化资源和高校学术资源，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研究的“高地”。

据了解，双方将从各自需求的交叉领域出发，联合开展江南文化的本体议题、江南文化的应用实践，以及江南文化推动上海市、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发展等层面的理论探索和应用研究；还将合力推进上海市级层面的江南文化研究哲社系列课题研究，共同开展江浙沪、上海不同城区及青浦地区的江南文化应用性课题研究，联合举办江南文化的相关论坛等。

此外，双方还将前瞻性开展江南文化示范区的可行性研究，对江南文化示范区的概念、内涵、发展目标、基本功能、规划布局等方面进行理论与应用结合的研究梳理。同时，还将进行江南文化示范区文化产业特性、类型、边界以及融合发展的媒介、方式、路径等方面的研究，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满足居民文化生活多层次、高质量的需求。

选自《人民日报》2019-7-8

武汉大学：“三个聚焦”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

武汉大学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摆在突出位置，着力健全体制机制，优化指导服务，支持和帮助教师加强教学研究、创新教学方式、提升教学能力，为整体提高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聚焦“以制度保教”，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成立校院两级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建立资源共享交流平台，实现校内、院内优质教学资源“全流通”。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工作交流活动，近三年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共组织各类工作坊、教学沙龙、讲座等活动90余次，参与师生近5000人次；学院（系）分中心开展相关活动1700余次，参与师生3万余人次，广泛交流教学经验、共同探讨教学问题。积极帮助教师进行教学职业生涯规划，建立“引、帮、促、建”全流程的教师发展支持体系，引入教学名师示范课和观摩课，支持教师承担教学发展专项研究课题，促进教师将科研成果运用于课堂教学，建设教师跨学科教学交流平台。大力推动两院院士、国家“万人计划”专家等高层次人才走上本科教学一线，六位院士20年同上一堂课；完善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制度，将科研前沿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

聚焦“以竞赛促教”，不断提升教学能力。积极组织教师参加校内外各种教学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寓教于赛”，形成比赛、示范、反思、提升“四位一体”竞赛模式。规定40岁以下青年教师全员参与两年一届的学校“青教赛”，并加强赛前教学观摩和赛后反思分享，促进教学能力交流提升。将教学竞赛纳入每年的院系评估指标和事业发展业绩奖励范围，设置“教师教学发展专项教研项目”，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学研究。

聚焦“以技术辅教”，不断创新教学方式。通过专项课题支持、示范项目引领等方式，引导教师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积极参与教学模式改革。创新教学方式，广泛运用智能化移动端教学辅助工具，实现百人大课堂“30秒迅速点名”、师生在线互动提问全覆盖等教学形式创新，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辅助作用。

利用学校教学模拟演练室“微格”教室，组织新入职教师 and 教学指导老师进行“真学、真帮、真促进”的实景演练，通过课堂观摩、教学设计、控时展示、师生互评、自我反思等环节，帮助新入职教师多角度观察和学习教学技巧，尽快提升教学能力，顺利完成从教学新人到教学“达人”的转变。

选自《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2019-9-4

东北林业大学：多措并举着力破除引才评价“五唯”顽疾

东北林业大学在推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过程中，将改革人才引进政策作为学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试验田”，完善引才计划，健全过程管理，努力破除引才评价“五唯”顽疾。

将师德师风考核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师德师风考核，把政治素质作为引进人才选聘考核的基本要求和先决条件。加强校院两级联动，强化学院基层党委选人用人主体责任，明确考核要点，优化工作流程，细化操作要求。严把师德师风“入口关”，学校层面通过外调、函调、阅档等方式，学院层面采取谈心谈话等方式，充分了解拟引进人才思想政治素质等情况。人才进校首个聘期内，在业绩指标中明确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

将总体设计融入引才工作实践。结合地域特点和学校实际，启动实施“5211 人才引进计划”，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开展引才工作，从2015年起，预计用5年时间引进各类人才200余名。在引才计划设计上，采取“三年一统筹，每年一调整”办法，着力解决引才“大小年”“计划没有变化快”等问题。在招聘工作设计上，采取全年“随时动议、立即考核、及时上会”办法，形成快速反应机制，简化引进程序，缩短人才招聘环节响应周期，提高人才引进工作效率，及时抢抓人才高峰期机遇。

将改革导向贯穿引才评价全程。在酝酿动议阶段，做到“不看出身看身手”，不设置第一学历门槛，着重评价人才特点和特长、研究方向以及工作内容。在面试考核阶段，以“用好成熟人才，培养未来之才”为出发点，注重评价人才与学科专业发展方

向的契合度和人才未来的发展潜力。在聘期考核阶段，既借助第三方评价，又发挥本校同行专家作用，做到“参照协议，不唯条框”，通过让人才讲好自己的“教学经”、编撰好自己的“科学故事”等方式进行考察。通过十几个环节的考核指标和考核动作的设计，让文案材料“跑起来”，让人才水平“亮出来”，使人才各取所需、各展所长，既符合学科专业发展大方向，又能立足自身特点个性化成长。

将服务意识作为检验工作重要标尺。坚持党管人才方针，成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按照“用心选人、精心设计、全校共识、全力支持”总体思路，认真梳理和细化引才工作的每个环节和关键节点，精细化做好引进人才的服务工作。在人才平台建设、职称晋升、项目评价等方面给予充分支持，营造适宜人才成长的学校整体“大环境”，指导敦促学院、学科、专业、团队建设良好的“小环境”“微环境”，把人才工作舒不舒心、顺不顺畅作为有关职能部门和学院人才工作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

选自《教育部网》2019-9-5

东南大学：扎实推进文化育人工作

东南大学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丰富文化育人内涵，彰显文化育人特色，不断引导广大师生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系统设计，完善文化育人格局。成立由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组长，分管领导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为主要成员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和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单位分工协作的文化育人工作机制。将文化建设纳入学校综合改革方案、“十三五”规划和“双一流”建设方案，确定文化育人工作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基本要求，将文化育人纳入学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制定实施“弘文计划”文化育人工作方案，明确14项工作举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学校特色校园文化，努力将文化育

人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强化融入，健全文化育人体系。依托学校人文教育资源优势，组织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开展“中华赞”经典诵读大赛、“书香校园”经典阅读、“东南大学诗歌节”等系列活动，并开设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专题课程和国学讲堂。实施“革命文化教育资源库建设工程”，挖掘红色校史文化资源及其育人内涵，加强对校内“团二大”遗址“梅庵”的保护开发，着力打造红色文化育人载体。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等主题，举办座谈会、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系列活动，深化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增强师生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复兴大任的文化自觉。加强校史文化建设，启动2019—2030年校史研究与编纂计划，完善学校历史图片库、文字资料库、名师校友库等。

创新形式，提升文化育人实效。依托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打造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项目“梅庵派古琴”基地，每年举办人文大讲堂、“高雅艺术进东南”等上百场文化活动，持续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与校外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等共建一批社会实践和文化体验基地，组织大学生实地教学考察，增强大学生继承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责任感。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月、西部支教、暑期社会实践等实践活动，组织走访红色革命根据地、深入贫困县开展精准扶贫等活动，让师生在社会实践中了解国情、感知社情、体察民情，提升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办好新生文化季、国防文化季、学生科技节、廉洁文化周等校园文化品牌活动，实施“校园原创文化经典推广行动计划”，提升大学生文化实践能力。

选自《教育部网》2019-9-5

福州大学：四项举措提升辅导员育人能力

福州大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坚持育人导向，围绕创新机制、把牢重点、团队协作、凸显特色，大

力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提升辅导员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推行专兼结合，打造坚强队伍。探索建立“专兼结合”“一对一”“以老带新”的“师徒制”，鼓励专职辅导员和兼职辅导员自由搭配组合，专职辅导员以思想价值引领为主、兼职辅导员以朋辈管理服务为主，形成分工明确、协同配合的育人模式，增强育人实效。制定兼职辅导员选聘办法，从选聘条件、选聘程序、培养考核、待遇保障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6年来累计选拔近300名优秀在读研究生担任兼职辅导员。通过与兼职辅导员签订用人协议、每个月配套劳动报酬、享受与专职辅导员培训培养同等待遇等措施，树立兼职辅导员主人翁意识，充分发挥朋辈育人功能，使其成为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力量。

推进专业发展，增强工作本领。把辅导员队伍建设纳入教师队伍发展总体规划，在职称晋升中单列条件和指标，将专职辅导员职务职级“双线”晋升机制落实落地，引导辅导员队伍向专家化纵深发展。出台落实高级职称辅导员工作要求的实施意见，对高级职称辅导员育人、科研等方面工作进行量化，作为评先评优、职务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着力培育一批思政育人“领头羊”。设立“优秀辅导员示范岗”，制定“辅导员日常工作十条”，支持优秀辅导员攻读马克思主义相关专业博士，树立辅导员工作标杆。选派优秀辅导员到地方和其他高校挂职、交流，进一步开拓辅导员工作视野和工作思路。设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融合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本化育人实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

注重团队建设，塑造育人品牌。以思想引领、心理服务、创新创业辅导、职业发展规划、传统文化育人、志愿服务等为主题，建设“少数民族学生工作室”“台港澳学生工作室”等一批辅导员工作室，实现辅导员全员参与。给予工作室专项经费支持，鼓励工作室跨院、跨校组合，定期开展集体备课、案例分析、学习沙龙、团体辅导、个体咨询、文创研讨等形式多样的线上线下活动，用团队力量为大学生提供个性化引导、辅导和帮扶。近3年，学校共有7

个项目入选教育部、福建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示范项目等，工作室已经成为凝聚育人合力的摇篮、创新育人理念方法的平台和展示辅导员风采的窗口。

指导创新创业，服务人才培养。鼓励辅导员积极参与人才培养改革，努力成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创造教育的重要推动者和组织者。依托创业学院和创业研究院，结合学校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的学科特色，建立指导师资库，成立辅导员创新创业创造工作团队。组织辅导员走进 500 强企业，参加国内外各类创新创业培训，每周开展集体研讨和案例分享，不断提升辅导员指导水平。学校每年参与各类“三创”竞赛的学生近万人次；在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中摘得 5 金 9 银，连续四届荣获“先进集体”。

选自《教育部网站》2019-8-16

★国际视野★

“学位学徒制”：英国职教再升级

在英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中，学徒制是已沿袭百年的重要方式。上世纪 90 年代初，英国政府推行“现代学徒制”，目标是“让学徒制学习成为 16 岁以上青年的主流选择”。2015 年，英国又推出“学位学徒制”，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延伸到高等教育范畴，让企业与大学合作提供课程，学生可以一边念大学一边在公司实习，毕业后既能获得学术认可，又能收获相关技能，甚至提前锁定工作。

这样的职教方式打破了学术与技能的边界，贯通了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目前在英国广受欢迎。

鼓励培养技能型人才

英国也经历过“重学术、轻技能”的时期，即便如今也不乏持这种观点的人。但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市场需求和政府重视使得英国社会整体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提高，已经形成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辅相成的良性平衡。

英国的国家义务教育到 16 岁为止，相当于初中毕业。有数据显示，义务教育结束后有 85% 的英国人会选择接受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其中 1/3 到半数的人会选择职业教育。庞大的市场需求令英国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的数量不断增加，即便近年来经过整合、压缩，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职教学校依然有 200 多所。

英国当地媒体报道，到 2020 年，英国计划培养出 300 万名学徒，使之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

为了激励更多青年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也为了逐步实现将义务教育年龄提高到 18 岁的目标，英国政府于 2015 年开始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推行“学位学徒制”，把职业教育提升到高等教育范畴。

该计划鼓励企业与大学对接，资助开设符合企业需求的技能培训专业课程。18 岁以上高中毕业生如果成绩合格，可以申请就读，不仅无需学费，还能拿到企业为实习支付的薪水。学制通常为三到六年，学习时间分为大学课程和企业实操，学生顺利毕业后可获得正规大学学士学位，还有很大几率直接进入提供课程的企业工作。

成绩好也愿当学徒

“学位学徒制”推出以来，广受英国学生和家長欢迎，报名人数逐年递增。《泰晤士报》近期报道了一名 19 岁女学生选择“学位学徒”的经历，从中可窥见这种职教方式对学生的强大吸引力。

这名学生高中就对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感兴趣，这两门课成绩都很不错，原本她想报考利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但在参观大学期间得知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该校提供“学位学徒的机会：学费全免，实习期间有底薪，第一年主要为校园学习，暑期到普华永道实习 10 个星期，第二年实习期 11 个月，最后一年返回大学完成大学学位课程的学习，毕业后持利兹大学学位到普华永道工作。

她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原本可以选择上大学的她最终选择当学徒。

业内人士告诉半月谈记者，由于企业参与度高，“学位学徒制”本质上属于企业“定向委培”。比如华威大学曾与路虎集团合作办学，参加的 120 个学生毕业后全部直接到路虎工作，还拿到华威大学的工程学学士学位。

助推职教改革

英国全国大学统一申请机构 UCAS 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英国大约有 30 所高校和超过 50 个企业合作提供大约 1500 个学位学徒机会。参与的公司包括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劳斯莱斯、空中客车公司、劳埃德银行等。

英国教育部呼吁更多企业与高校联手，设计推出更多学位学徒项目，丰富学生的选择。

英国舆论对“学位学徒制”评价积极，认为其能满足不同层次技能培训的实际需求，为学徒继续深造提供可能，也利于改变职业教育相比学术教育层次低、无前途的传统印象。

英国大学也很支持这样的企校合作。英国大学校长协会主席、肯特大学副校长朱莉娅·古德菲勒说：“学术和职业教育之间的人为分界线正在逐渐消失。”

英国高等教育专家普遍认为，要实现职业教育的真正尊重和相等相待，就必须确保学位升级路线，英国需要能够将学术、技术和专业技能结合起来的毕业生。

选自《东方新闻网》2019-8-20

美国一流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经验和启示

李浩 尤玉军 马吉晓

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是衡量大学综合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要将提升大学科研水平作为长期建设任务。在当前“双一流”建设背景之下，大学是联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桥梁，也是推动“产学研”结合的主体。目前，我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亟待进一步提升。美国一流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效果较为突出，其路径可为我国大学借鉴。

一、多维归因：美国一流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要素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科技创新实力举世瞩目。美国一流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颇具文化渊源且有多重原因，其影响

要素主要是文化理念、政策法规、组织机构，具体表现如下。

1. 文化理念要素

实用主义是美国本土哲学，它起源于十九世纪，被认为是当代美国的主流哲学流派。其主要内容包括：要将哲学与现实相结合，追求美好的生活；反对将哲学与生活分离；以人为中心，注重以生存为导向的行动。

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美国创办了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的硅谷科技园，以及以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为基础的公路科技园。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自由、平等、独立是个人主义的主要内涵，该思想认为人可以改变命运，通过不懈的奋斗，个人的价值总会突显，社会总会向好的一面发展。

这一文化价值观源于美国的早期移民和建国历史，并随着美国一流大学办学模式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突出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美国一流大学重视“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使大学走出象牙塔，纷纷积极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将其直接作用于社会。

例如，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威斯康星观念”，它的实质是大学协助州政府在各个领域开展技术推广服务和函授教育，帮助本州公民推动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务实、行动、实效的实用主义本土思想的推动下，并深受自由、平等、独立的个人主义思想的直接影响，经历了时间的打磨，美国一流大学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大学发展模式，即有效地兼顾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巩固服务社会的能力并使之协同发展。

2. 政策法规要素

美国政府出台了推动技术的发展、推广和转化的相关政策，使其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路径的不断完善。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技术发展、推广和转化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法规的要点包括：高校必须大力研发和转让科技成果，否则政府将收回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应首先考虑向小型企业转让技术；相关技术生产场地主要在美国；转让费中的一部分支付给发明人，国家实验室技术转让费中至少给予发明

人 15% 的分配份额，其余应当用于科技研发；研究机构必须设立技术转让部门，并保证其运营资金充足；联邦机构应当为中小企业的研究开发提供专项资金；研究人员有进行技术转让的责任；推动科研院所和高校之间开展技术合作，制订技术合作计划。这些法律有效地促进了美国一流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

3. 组织机构要素

1974 年创立的大学专利管理者协会（SUPA）是民间性质科技转化中介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有效地许可和保护美国一流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20 世纪 80 年代末，大学专利管理者协会正式更名为大学技术管理域外视角者协会（AUTM），它旨在通过提供技术转让服务，促进大学将顶尖的研究成果市场化，并且激励、留用和招揽研究人员，从而使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联系更紧密，创造就业机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美国的国家技术转让中心（NTTC）于 1992 年 5 月正式成立，是国家层面的中介转化机构，提供技术成果转化服务。1993 年，美国成立了专门的科技管理部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

美国一流大学都设有专门负责技术转化的机构，这是大学自身的内部机构，主要职责是鼓励和帮助师生将科技成果充分市场化。此外，美国还高度重视科技情报网络建设，建立了国家层面的技术转化平台，正是由于这一平台的建成与应用，大学获得了更加便利的服务。在这样一个完备的组织机构的保障下，美国一流大学才能成功推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

二、纵深布局：美国一流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

世界著名的硅谷、北卡罗来纳三角科技园等是美国一流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的标志性案例。这些成功案例的背后，是美国政府和大学的纵深布局：一是基础牢固的大学科技园和孵化器建设，二是方式多元的专利成果转化路径，三是可持续的高素质人才培养策略。

1. 创办大学科技园和孵化器

科技园一般是指聚集高新技术企业的园区。大学科技园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的产物，科技园发展的关键是生产、学习与研究的结合，

并且以产业链的上下互动为重点。美国的一流大学和企业共同参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这不仅为一流的大学提供了实践的场所，也为企业提供了高层次人才。

在美国，许多地区都有科技园和孵化器。其中最著名的硅谷科技园已经有超过 10000 家大型和小型电子产业公司。硅谷的成功主要在于附近拥有强大研究能力的大学，比如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圣何塞州立大学等。硅谷容纳了数以万计的科技企业，如惠普、英特尔、谷歌、苹果等。硅谷中的孵化器主要有：Y Combinator、Techstar、Plug and Play Tech Center 等。

另外一个较为著名的科技园是北卡罗来纳三角科技园。该科技园在政府、高校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诞生，研发机构“三角研究所”同时建立，吸引了 IBM、爱立信、杜邦等世界知名企业。此外，美国环境与健康研究所等国家研究所也在这里。

这些以大学为基础的科技产业园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的迅猛发展，也推动了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崛起。

2. 转让专利成果

长期以来，凭借着强大的科研实力以及与企业深度合作的经验，美国一流大学在专利申请的质和量都较为突出。由此，美国一流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另一个重要路径就是转让专利成果，具体包括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一次性转让：顾名思义，这一路径是大学向企业一次性转移其专利，并且由企业提供开发和投入市场所必备的设备、场地、资金等。这样，大学可以为直接赚取利润而研发，它是美国一流大学技术转让的主要方法。

第二种是股权投资：大学可以通过提供技术成果入股企业的模式，将技术提供给中小企业，建立合作，协同发展，从而实现成果转化的目的。大学仅以技术成果折价入股，也不对其企业控股。企业在取得产品的产出收益时，按照约定的分配方式向大学发放一定的分红。

第三种是利用专利创立新企业：专利持有人利用专利创办他们自己的企业并将他们的产品市场化。有数据显示，美国百分之十左

右的专利技术转让是通过创立新企业的方式来进行的，其主要发展领域集中在生物技术和医药。就大学而言，创办新企业更有利可图。

3. 培育高水平科研人才

美国的一流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高还归功于他们有一批高素质的研究和服务团队。

美国的一流大学不仅鼓励研究人员开展科学研究，为研究人员的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各种便利和激励，而且在教学过程中也体现对研究团队的重视和培育。

在学校，学生不仅学习专业知识，而且还被倡导在实践中掌握各种技能，学校鼓励学生自行转化科技成果，而且尽全力给予他们各种便利和适当的经费。在这种宽松的学习环境中，学生们也可以从学习中挤出时间，集中精力进行科学研究。大学生正是在这样的培养模式下，提高了自己的科研能力，品味科技成果转化带来的乐趣，从而成为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人才。

三、求新求变：“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提高国内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使命

当前，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指导下，大学要加强政策研究，不断探索和完善相关政策，树立新的理念，将政府、学校、企业、个人统筹，从而形成多元化合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1. 树立新的指导理念

在社会层面，要倡导务实的文化理念。美国一流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是全社会倡导的实用主义理念。正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美国的一流大学走向社会，有效地加速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完美体现了实用主义提倡的“行动效应”。

另外，在整个美国社会中，从政府到普通民众，都在不断地支持创新，强调创新的效果。这些都为我国营造加速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指导理念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在学校层面，要全面提升研究人员对市场需求的认知。

首先，学校要从机制上给予科研人员充分支持，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并且给予职务职

称晋升、工资福利待遇等优惠的政策。

其次，学校可以用科技成果及其转化所产生的效益等指标来考评研究人员的绩效并予以奖励。要激励研究团队去贴近社会，提高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市场的关联度，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在企业层面，要积极促进广大企业放眼未来机遇，加强与大学或科研院所的合作，提升创新力和竞争力。

在个人层面，研究人员应该走出去，为社会服务。科技人员应该树立主动服务的理念，直接了解企业的技术需求，创造出更实用的科研成果，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2. 营造新政策环境

2016年，教育部、科技部共同发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大学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除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外，不需要审批或备案。大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全部留归学校，纳入单位预算，不上缴国库。

201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教育部办公厅也开展了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专项督查工作。

未来，政府的相关政策还会进一步优化，会更多地考虑多层次的需求，以更加多元化的手段进行调控，“科技新政”永远在路上。

学校方面，应该改革评价体系，提高职称评价中的实践性分值的比重，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在研究人员的职称评价体系里的分值比重。这就要求学校建立一套多元化的职称评价体系，包含理论价值、成果价值等。这一举措对激发研究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在营造新政策环境的基础上，还要引导科研人员加强对政策法规的理解和研究，要及时运用法律武器，有效地将自己的辛勤劳动成果加以保护。

另外，对于司法人员来说，要切实加强执法工作，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违法行径。

相信在此基础上，通过各方努力，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将迅

猛提升。

3. 打造新组织构架

政府要加强对中介行业发展的引导。政府要积极通过各种政策，引导中介行业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展壮大，使市场成为成果转化的主要推动力。政府应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巩固市场在整个资源的配置过程中的决定作用，逐渐减少政府资本入资比重，加大社会资本比例。同时，在引导中介行业发展的基础上，政府还要转变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技术转移机构备案制度，通过多种方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政府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建立全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网络平台。要促进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有效沟通，充分发挥互联网信息丰富、互动性强的特点，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大学在建设科技成果推广和技术转移机构的基础上，要更加专业地提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依托其法律、技术和管理的专业背景，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整个过程提供咨询服务，统筹各方利益，调动各方积极性。

选自《中国高等教育》2019年第9期

报：市教委政策法规处、发展规划处；校领导

发：校属各单位
